



华南师范大学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EWS
LETTER 第十期



CACIE 2022

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 EXPO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三）

Seminar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at Undergraduate Level & the Above (III)

主办单位
Hosted by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承办单位
Organized by



华南师范大学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时间：待定 - 北京 · Beijing

全球合作伙伴
Global Partners



星耀合作伙伴
Gold Part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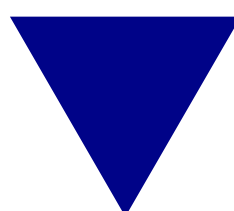


指定合作伙伴
Official Partners



《跨境教育通讯》

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基地)



跨境教育 质量为本

当今世界，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进行。“抢占国际化办学高地”正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学生流动、人才流动、学术流动、办学流动等为载体的跨境教育备受国际教育领域各方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哈佛大学要求所有学生都有“国际经验”；耶鲁大学制定了全盘国际化战略规划；欧盟通过“博洛尼亚进程”推进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动跨国界教育体制改革。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跨境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截至目前，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各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近2300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近1200个；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学生达到66.21万，2019年大概率超过70万；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留学目的地国和世界最大跨境教育资源国家。

质量是跨境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根本。在中国跨境教育规模日益扩大的今天，质量保障尤为重要。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加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同时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质增效，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是新阶段跨境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跨境教育质量的提升，助力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事业的发展，2018年7月，华南师范大学成立“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2019年1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我校达成协议，依“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中心”设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中心秉持“创新开放、合作共赢、追求卓越”的发展理念，从事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其它形式跨境办学质量保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努力打造成为我国跨境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和质量保障研究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之一。

《跨境教育通讯》(Newsletter)是我中心分享国内外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前沿思想动态与实践经验的形式之一。本刊暂设教育政策、观点纵横、经验分享、国内视野、海外视野等五个栏目。提供国内跨境教育领域的重大影响事件和重点新闻资讯；传递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跨境办学的最新政策导向；聚焦国内外在跨境教育质量保障领域的经验做法；报道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最新的情况；转载国内外有关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名家评论、论文著作、会议讲稿、活动信息和数据解读等。

我们衷心希望，每一期发布的《跨境教育通讯》能够为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从事跨境教育工作的其他机构提供信息参考，成为关心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事业的有识之士的日常读物。

目录 CONTENTS

【教育政策】

-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关情况介绍 01

【观点纵横】

- 这十年，中外合作办学交出满意答卷 03
- 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时空特征、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08

【经验分享】

- 非凡十年·广东答卷 | 四所中外合作大学 16
- 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探索与制度创新——上海纽约大学十年办学历程 12
- 制定实施全球战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五年总结 16

【国内视野】

-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届学生开学典礼并致辞 23
- 香港与内地高校合作共融共赢 24

【海外视野】

- 制胜全球：英国国际教育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建构(节选) 27
- 疫情背景下美国一流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34
- 韩国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40
- 日本海外学校对中国的启示 44

【中心动态】

- 关于邀请参加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平行论坛——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三)的通知 46
- 中心主任吴剑丽参加受邀参加2022高等教育国际化论坛并作专题报告 48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关情况介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场合宣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饱含深情给海外学子、留学归国人员、在华外国留学生、外国中小学生回信，为教育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教育对外开放、中外人文交流的指导意见，国际合作与交流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

十年来，我们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注重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召开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议，印发《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推动中国教育以更加开放自信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从以下五个方面介绍了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总体情况。

一是开放总体布局不断优化，教育的“朋友圈”更大了。

我国同181个建交国普遍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与159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了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与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深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强同共建国家教育领域互联互通，建设了23个鲁班工坊，启动了海外中国学校建设试点。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启动“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深化中国—中东欧教育交流合作，点面结合的区域教育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二是开放高地建设不断提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更强了。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全方位开放。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打造国际合作教育样板区和国际人文交流汇聚地，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与北京市合作设立“留学人才回国服务示范区”，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与此同时，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立足区位优势，扩大面向周边国家的教育开放。引导高校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推进“双一流”建设，依托国家公派留学助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支持组建国际高校联盟，参与国际学术组织，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领域、跨国界的科研合作。教育部于2018年启动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以来，累计吸引70多个国家超过1.4万名专家学者参会，开展部门间和专家“一对一”科研合作2300多项，中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4000多人。

三是改革促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内生源动力更足了。

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信息化手段支撑全链条留学服务体系，开通“国家留学人才回国就业服务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与此同时，中外合作办学蓬勃开展，审批、管理、评估、退出机制不断完善。过去10年，新增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理工农医类占比达65%。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出国留学受阻发挥了积极作用，累计录取近万人。来华留学在推进制度建设、实施质量保障、严格入学标准、规范培养管理、加强留华毕业生工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2020—2021学年，在册国际学生来自195个国家和地区，学历生占比达76%，比2012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

四是人文交流格局不断完善，中外“心联通”更紧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人文交流形成了元首外交引领、领导人高访带动、高级别机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国内国外统筹、中央地方联动、官方民间并举的多元互动新格局。过去10年，教育部共举办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37场，签署300多项合作协议，达成近3000项具体合作成果。在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形成了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中俄同类大学联盟、中英中法百校交流、中南（非）职业教育联盟等教育品牌项目，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了正能量和暖力量。

五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断深化，国际影响力更大了。

围绕教育减贫、抗击疫情等全球性议题，我国持续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共同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质量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安全返校行动”等项目。全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教育合作，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成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金砖国家职业教育技能大赛的倡议，主办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成功举办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大会，积极筹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搭建全球性高端教育合作平台，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开放合作成为推动新时代教育变革创新的关键要素，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深刻认识到，开放合作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应有之义。面向未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把党的全面领导、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到教育对外开放各领域全过程，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立足中国国情促开放。

我们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畅通国内国际教育循环，构建面向全球的教育伙伴关系，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我们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完善教育外事管理体系，确保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来源：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49/twwd/202209/t20220920_663141.html

责任编辑：王燕苹

「观点纵横」

这十年，中外合作办学交出满意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合作办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扎根中国大地办学，以质量建设为主线，切实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加以消化、吸收、融合、创新，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路径。回望十年历程，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在这历程与成就之中，蕴含着对未来之路的深刻启迪。

一、以过硬教育教学质量通过疫情大考

经过多年建设，中外合作办学顶层设计日臻完善，改革创新不断深入，规范化进程快速推进，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质量建设成效显著，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得到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尤其是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出国留学人员无法留在国外或暂时无法前往国外学习，一些学生面临就学“空档期”。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聚焦在中外合作办学上。如何缓解出国留学受阻问题，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成为摆在中外合作办学面前的一大考题。

教育部连续三年出台政策，支持在办的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按比例临时增加自主招生名额，招录已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2020年至2022年，以具有法人资格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代表，共有100多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临时扩招，双向选择、择优录取，为学生提供国内求学机会；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以校际交流、委托培

养等学分互认形式，接收出国留学受阻学生短期就读，为其提供国内学习平台；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根据合作办学特点，整合各类教学资源，总结在线教学经验，广泛应用新技术变革传统教育教学方式，推进了在线教学质量建设。中外合作办学应对疫情的临时扩招以及其他相关安置措施和教育教学安排，有效疏解了疫情影响下的出国留学难题，保障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安全稳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普遍赞誉。

事实证明，中外合作办学以自身过硬的总体质量和国际竞争优势，经受住了社会“聚光灯”的审视，经受住了百年疫情的大考，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抗击疫情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二、十年来质量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举办的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2356个，其中本科以上层次机构和项目1340个，专科层次机构和项目1016个。合作对象涉及39个国家和地区，1000余所境外高校，900多所中方（内地）高校。十年披荆斩棘，十年繁花似锦。数字的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合作办学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成就。

第一、中外合作办学的地位更加显著，政策体系日臻完善。

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为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合作办学擘画了宏伟蓝图、作出了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场合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多次对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合作办学作出重要指示；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作了部署。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这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发展方向。十年来，中外合作办学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制度创新卓有成效。

十年来，中外合作办学顶层设计基本形成，为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打造了四梁八柱；从申请、审批到设立、管理、评价、退出，质量建设的主线贯穿其中。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持续前行，是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必然要求。

第二、严把“入口关”，引进教育资源整体水平持续提高。

1.坚持审批制度，推进了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常态化机制建设。中国教育机构应与相应层次和类别的境外教育机构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和（机构）章程，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引进高水平外方课程和师资，颁发中方学历学位证书、外方学历学位证书。在发展过程中，中外合作办学审批机关及管理体制都发生

过一些调整 and 变化，社会上出于良好愿望，曾出现过“取消中外合作办学行政审批”的呼声。然而，实践证明，对申请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实行行政许可制度，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保障，是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2.在坚持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十年来，教育部和相关部门改进了审批程序和流程，优化了办学目标、办学基础条件、规划、学科专业设置、资源引进、教学组织、管理架构、财务制度等准入指标及其权重，开展专项治理“麦当劳式连锁店”办学，强化了对拟办中外合作办学中方院校国际化办学条件和办学基础的考察和审核，增加了其在准入标准中的权重。同时，先后批准了广东、福建、浙江、重庆、河南、海南共建中外合作办学部省联合审批机制；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部省联合审批试点省份进一步增加；开展了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雄安新区中外合作办学区域创新试点，在特定区域适度放宽准入条件、办学主体资格限制和审批权限。比如，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贸港独立办学；在上海试行“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工农医学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备案制”；推进雄安新区中外合作办学政策体系和规划建立完善；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办学改革举措，赋予港澳高校在内地更大办学自主权；加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支持、引导与资源倾斜力度；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关键国家的合作办学，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第三、规范管理，质量保障机制更加完善。

1.强化日常监管。管理部门大力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成本“阳光核算”和招生简章规范性、收费项目审批程序完整性建设，加强引进教材选用审核机制和使用评估机制建设，强化师资聘任标准、程序建设，建立违规通报制度，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和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提高信息披露专业化、法制化水平。

2.推进评估常态化、规范化。将评估作为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制度和培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变更、延期的重要依据。管理部门对办学机构和项目开展初次评估和定期评估，并建立专项评估制度，根据需要开展不定期专门或定向评估，全面检查依规办学、履行合作办学协议、遵守合作办学机构章程的情况。目前，教育部共开展11轮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基本实现了本科以上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定期评估全覆盖。

3.完善退出机制。2014年9月，教育部公示了停办的252个本科以下机构和项目；2018年6月，公布了批准终止的234个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此后，继续用好引退程序，批准终止了若干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管理部门引退办学水平低下的机构和项目，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和指导相关办学单位对终止的机构和项目开展财务清算、清偿、注销登记等后续工作。这一举措保障了学生、家长和办学者的权益，提高了中外合作办学社会满意度，得到了社会各界及舆论积极正面的支持。

这十年，管理部门有针对性部署了对质量建设具有牵引性的专项规划和专项改革，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推动形成积极向上的办学环境，激发了办学单位发展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的活力与合力，富有成效地贯彻了“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方针。

第四、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1.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满意度不断提升。2021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67个机构和项目的6800多份学生问卷中，学生对中外合作办学总体满意度达98%。由于人才培养质量高，不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高考录取分数线逐年提升。

2.“强强联合”，优质课程、优质师资、优质科研平台等资源核心要素的实质性合作日益频繁和深入。世界200强高校中75%以上与我国开展了合作办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的合作数量有所增加；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80%以上开展了合作办学；地方院校在“一流建设”中把中外合作办学排上重要议事日程，办学质量快速上升；职业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的有400多所；中外合作办学举办硕博层次机构71个、项目276个，与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生物医学、环境生态等领域组建数十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了中外教育教学理念融合创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急需紧缺人才。

3.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社会认可度和就业质量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除了不少升学世界知名高校之外，一大批毕业生主动面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入职跨国公司、大型国企、国际组织等，有的在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发挥重要作用。中外合作办学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不断攀升。由于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和国际化特征，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用人单位普遍认可。

十年来，中外合作办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一是中外合作办学在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中发挥了多重天然优势，成为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的重要依靠力量。中外合作办学在促进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围绕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前沿交叉领域和基础学科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外合作办学推动人才国际交流，汇聚境内外高水平人才，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有效增强了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切实提升了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及国家相关人才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的适应度和支撑度。二是中外合作办学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引擎”“排头兵”“试验田”，推动建设一流学科并形成与高质量教育体系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借鉴外方合作高校管理理念和教育教学的成熟经验与做法，促进管理观念和方式转变，推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以中外合作办学带动学校国际化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顶尖认证机构的质量标准体系，促进我国高校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此同时，中外合作办学积

累的可复制、可推广成功经验日益增多，为国内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了不少新经验和新启迪。当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已经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推进。这一新举措取得成功之后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即将产生的辐射作用值得期待。

三、十年建设成功路的深刻启迪

这十年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外合作办学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全面领导。中外合作办学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彰显了党领导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制度力量。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是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二、坚持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作为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重要载体，中外合作办学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和方向十分明确。当前，世界处于百年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中外合作办学面临新的外部发展环境，我们更要增强战略定力，保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和坚强信心。

第三、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加以消化、吸收、融合、创新。中外合作办学要切实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大引进范围、提高引进质量。但是，引进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对引进的教育资源进行吸收、消化、融合、创新，是我们自己闯出来的合作办学质量建设成功路径，必须贯穿办学全过程和各环节。

第四、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课程教学改革。中外合作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课程教学改革是核心。体制机制改革应围绕课程教学改革这个核心进行，才有利于质量提升。应根据质量建设目标要求，协调推进两种改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牢牢牵住师资建设这个“牛鼻子”，保障师资“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第五、坚持以理论研究促实践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性很强。时代赋予了理论工作者开拓和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专门研究领域的责任并提供了研究环境。理论工作者要面向现实不断创新，使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政策支撑、专业支持和人才保障有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9月29日

作者：林金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王燕苹、黄欣丽

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时空特征、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一、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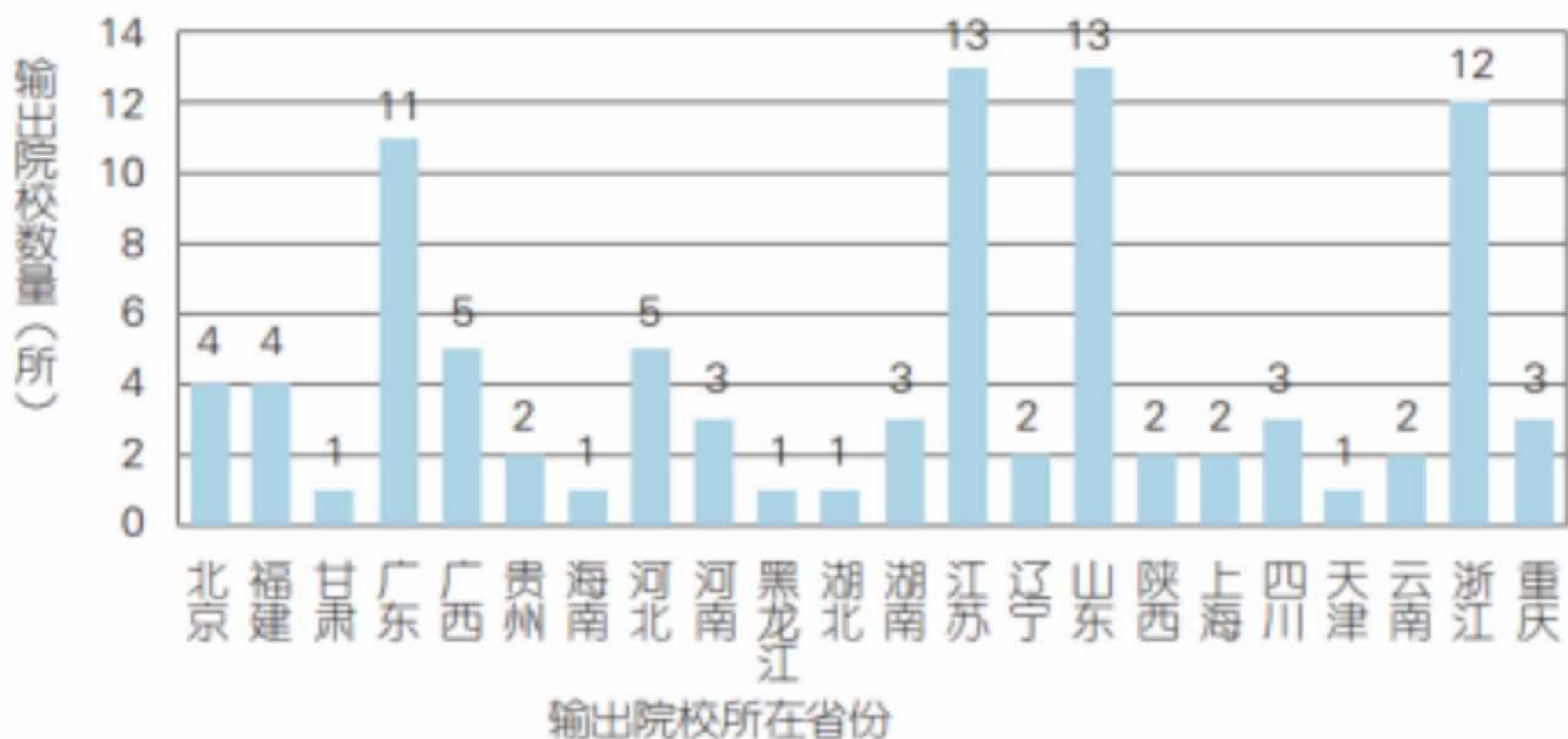
（一）中国职业跨境输出规模演变

从时间分布来看，最早的境外办学可追溯到2012年。从2014年起中国对外开办的职业院校数呈现增加趋势。其中2018、2019年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达到高峰，这两年职业教育新增对外办学数量分别为30所和49所。2019年后由于疫情等原因，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办学的数量增长有所减缓，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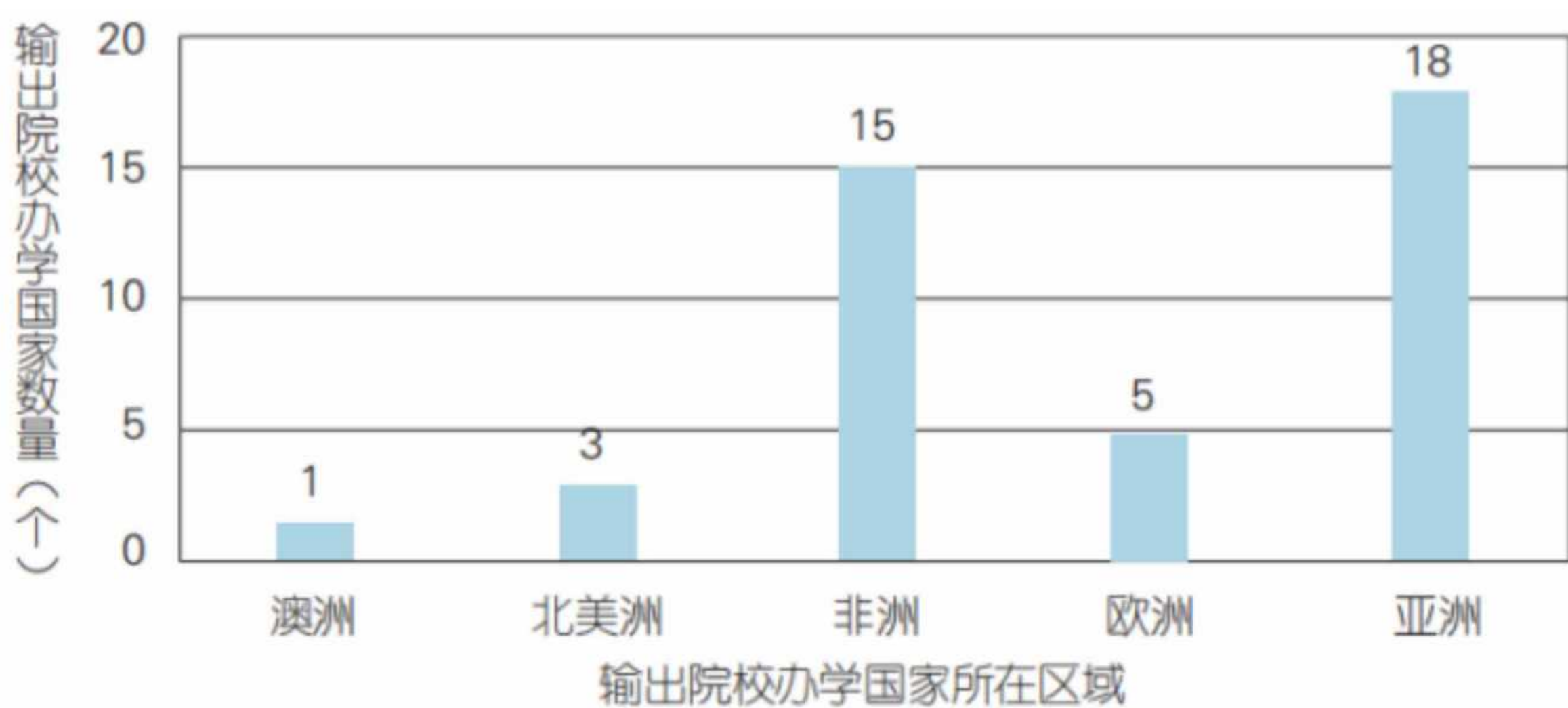
（二）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院校省域分布

从境外办学职业院校分布来看，94所输出院校分别分布在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云南、浙江、重庆等22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江苏、山东两个省在外开设职业院校的学校最多，分别为13所；其次为浙江、广东，在外开设职业院校的学校分别为12所和11所，余下都在5所及5所以下。见下图。对外办学较多的职业院校主要由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主导，在地区分布上存在非均衡性，也基本反映了国内各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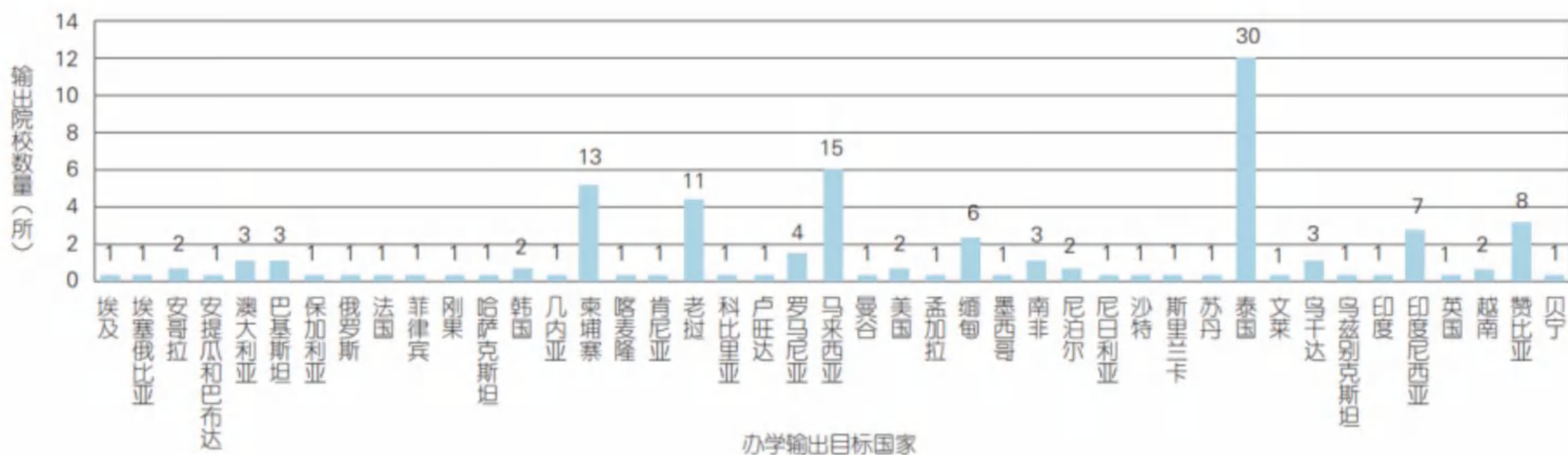


(三) 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目标国家

从合作对象来看，中国职业院校跨境输出涉及的目标国家逐步拓展，覆盖范围从试探输出的零星区域逐步延伸到世界五大洲21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分布上也呈现非均衡性，东南亚区域、非洲区域最为偏爱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中国向这两个区域输出的职业院校也较多。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具体地域分布来看，合作的亚洲国家有18个、非洲国家有15个、欧洲国家有5个、北美洲国家有3个、大洋洲国家有1个，总计42个国家。见下图。这其中与我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及相关协议的国家，一共有37个。仅有墨西哥、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5个国家没有与我国签订有“一带一路”合作相关协议。这反映出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有序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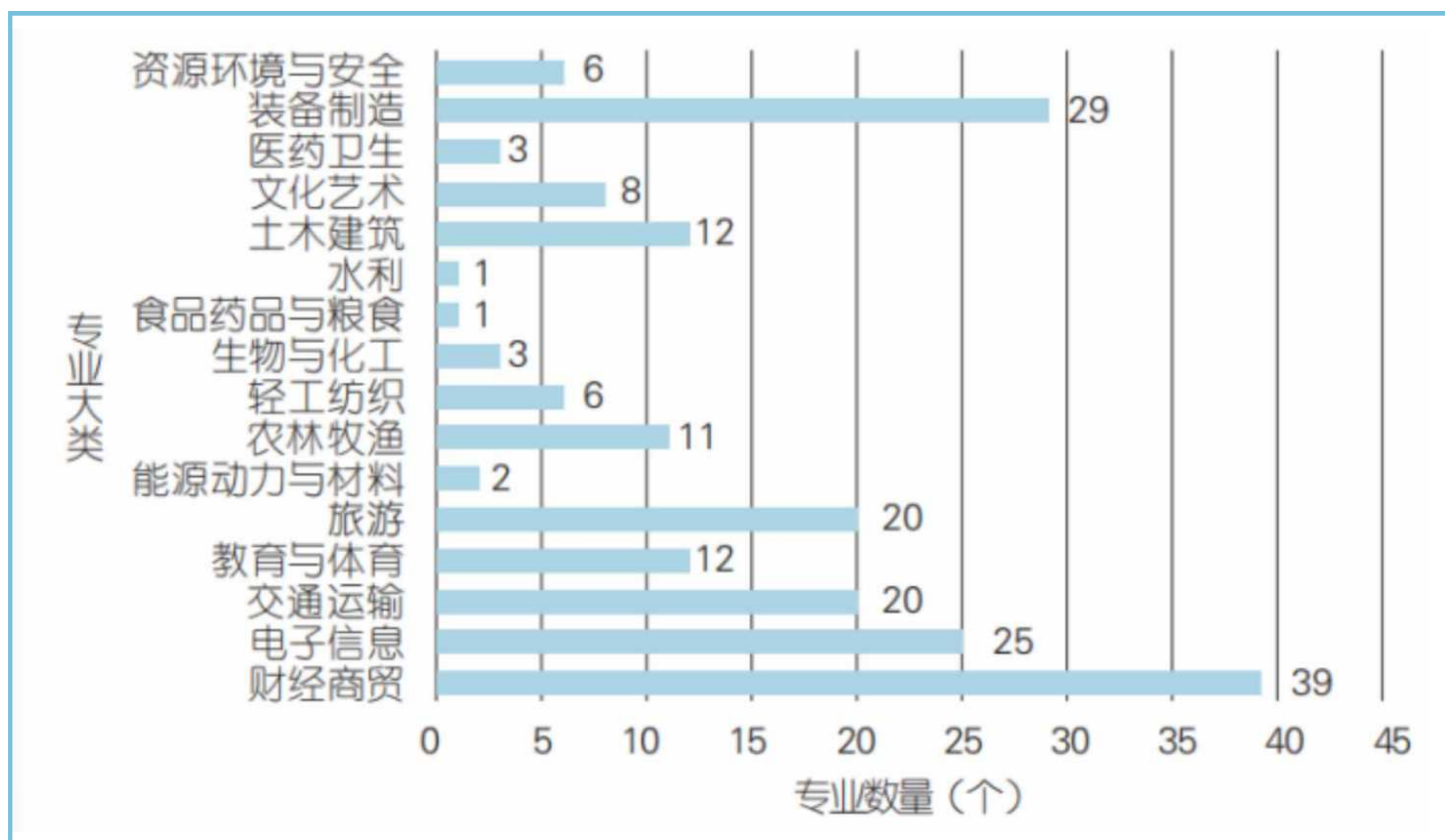


输出目标国家的办学院校数量共计142所，具体分布见下图。其中，中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院校分布排在前8位的东道国依次为：泰国30所、马来西亚15所、柬埔寨13所、老挝11所、赞比亚8所（分院）、印度尼西亚7所、缅甸6所、罗马尼亚4所。其中，中国—赞比亚学院为多所院校和企业合作办学，每个国内职业院校负责1个分院的建设，这里统计的是分院。



（四）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专业设置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职业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的专业较多，但总体分布呈现非均衡态势。依据教育部高职高专专业大类分组，经过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8月，中国职业教育对外跨境输出专业总计16个大类，共计198个专业类别。见下图。



二、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模式

（一）以接受政府委托承接援助培训的模式

职业院校作为国家援外培训项目承办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举办援外培训。援外培训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分别为政府官员管理能力培训、相关行业的技术技能培训以及师资能力提升培训。如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在2012年开始承担面对亚非拉、东欧和南太平洋地区几十所学校的援外项目，承担这些国家相关官员和技术人员培训。仅2017年该校承接的商务部委托的第42期援外培训项目，就涉及上千名发展中国家官员和技术人员。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至今已承办115期发展中国家港口管理、汽车产业、职教管理等研修班，累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产业官员、职教官员和教师2650人。

综合来看，职业院校承办援外项目的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承担院校从早期相对集中几所院校逐步拓展到多所职业技术学院。如早期只有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等少数院校承担对外援助项目，现在各省几乎都有一所或几所院校承担此类项目。二是委托职业院校承担对外援助的部门逐步从商务部扩展到其他多个部门。一直以来，商务部委托职业院校承办对外援助项目较多，后来农业部等部门也逐步开始增多委托职业院校承办对外援助项目。三是委托职业院校承办对外援助项目的内容逐渐丰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援外培训项目涉及的行业、培训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涉及招商引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教育、大数据、管理、海关、文化、制造、电子等多个专业或领域。

（二）以招收留学生培养输出人才的模式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要建立并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了多领域、宽渠道、立体性的经济合作与产业互动，急需各类具有较好素养的技术技能型及实践型人才。“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激发了我国高职留学生教育的内生动力，激活了我国高职教育对外输出能力。中国较多职业院校都在积极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各地人民政府也纷纷出台支持举措。以江苏为例，为提升境外招生工作成效，江苏省制订了《留学江苏行动计划（2014-2020年）》，2017年起连续多年组织职业院校分别赴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参加国际教育展，并在这些国家举办“留学江苏”专场推介会。2020年，江苏省有44所高职院校招收留学生7652人，其中学历生6533人，占85%。浙江省高职院校2020年留学生规模达到3751人，湖南省高职院校2020年留学生规模达到711人，广东、海南、河南、江西等高等职业院校2020年分别招收留学生356人、246人、250人和114人。

从各个省份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趋向来看，呈现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实施措施多样化的趋势，如通过设立国际学生奖学金制度、对学历教育外国留学生实行生均拨款政策、推荐留学生到合作企业就业制度等，各个省、市都在积极鼓励国家、省级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利用学校品牌和专业优势吸引境外学生来华学习。在留学生招生专业上，从以语言学习、文化交流为主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同时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认证标准已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留学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也逐步完善。

（三）以境外办学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职业院校紧抓“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服务“走出去”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对先进技术服务的需求，与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培训学校、行业企业等在师资培训、技术技能人才属地化培养、员工培训以及技术技能创新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并设立境外分校和实践教学基地，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实现形式，培养“一带一路”的建设者和“走出去”企业的协同者。如淄博职业学院与坦桑尼亚国家交通职业学院制订“中坦汽车工程鲁班工坊建设方案”；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设立安美德教育城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塔什干鲁班学院等。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山东省高职院校国（境）外办学点达20个；浙江省国（境）外办学点数量达到了22个；江苏省已有20所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43个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四川省高职院校在境外的办学点为25个。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境外合作办学数量仍保持增长，并且各省职业院校通过多渠道的线上教学、线上项目合作等方式，拓展了合作模式。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在国外已形成了较大影响，向世界输出了中国职教方案，也促进了中国国际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同时境外办学服务教育对外开放的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四) 以专业标准输出提升国际话语权模式

各省高职院校致力于建设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积极探索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教育资源输出新模式。通过引进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认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开展本土化改造、鼓励学校对接国际标准开发课程资源等形式，建设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努力塑造着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形象。如湖南省高职院校2020年共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院校输出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和和其他标准共计711个，较2019年增长10.58%，其中专业教学标准138个、课程标准382个、其他标准191个。浙江省高职院校2020年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数65个、课程标准数447个，分别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4.03%、8.49%。山东省2020年共开发并获得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63个，开发并获得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335个，拓展了国际合作办学的深度和广度。四川高职院校2020年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43个，较2019年增加了2个；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250个，较2019年增加了34个。随着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逐步推进，办学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中国高职院校输出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的能力呈现提升之势。

(五) 以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国际影响力模式

中国职业院校持续扩大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范围，通过在国际组织任职、参与国际职教事务、承担跨国企业境外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国际会议、参加国际技能比赛等形式，加强了中外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与不同国家职业教育互访交流的形式和内涵，建立了多元互动的合作交流机制。如河南省有近60所高等职业院校与30余个国家、地区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了不同领域、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交流合作，推动了人才培养标准的互联互通。湖南省高职院校借助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合作职业教育产教联盟、铁路国际人才教育联盟等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传播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0年，江苏职业院校入选了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WFCP）成员，并先后成立了江苏美国高职教育合作联盟、江苏德国高职教育合作联盟和“一带一路”人才培养高职院校合作联盟等3个中外校群合作平台，4所高职院校获批外交部亚洲区域合作专项基金——“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2020年山东省教育厅先后组织“一带一路”中泰教育国际合作与发展交流、“相约上合”山东—俄罗斯教育合作交流、中日教育交流合作对话会，并成立了中日（山东）教育国际合作联盟、中俄（山东）教育国际合作联盟等。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活动呈现出学术交流、人文交流、民间交流并进的局面。职教领域长期、稳固的机制化合作平台逐步建立，这些平台成为职业院校集聚和整合国际化办学资源、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渠道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有力依托。

(一) 职业教育师资实践经验比较缺乏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过剩产能不断转移，急需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而职业教育跨境输出对师资队伍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先进的教学理念、较强的沟通能力，同时在专业领域要求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熟练的实战操作能力，洞悉行业发展趋向和专业发展态势，熟悉专业在输出目标国的人才培养标准等。目前来看，较多职业院校教师从学校到学校，没有职业经验和实践经历；或有些教师有企业工作经历，引进来后担任多门不同和不熟悉课程的教学，造成教师忙于课程教学、指导学生竞赛，以致在实践性方面做得不够好。

(二) 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专项政策较少

中国在推动教育国际化合作方面已经出台了较多政策和法规，涵盖国际交流、双向留学、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境外办学等多个领域，但从政策、规章的聚焦点来说，总体还是主要侧重于普通本科教育，如《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中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相关政策近年来也有出台，但总体来说相对较少，并且很少涉及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战略，较少规范职业院校境外办学的发展思路和发展重点，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无偿贷款、技术支持相融合的“一揽子”援外政策有待补充，职业教育国际化专项经费支持还比较缺乏，对境外输出校企合作双边的规定及鼓励企业合作的积极性政策还需调整，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效应也需要定量评价。为此急需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体系，并对现有政策进行整合和完善，从而提升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质量和办学水平，促进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 校企合作共同输出深入程度不够

职业院校目前已经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中，较多是学校为了自身发展而主动追求与企业合作，企业自身的合作动力并不高，主动要求与学校合作的企业较少。校企合作的真正内涵在于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领域共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分担，形成命运共同体。从这点上看，虽然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较多，但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还比较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校企合作经验比较缺乏。并且由于职业院校自身的科研能力较弱、社会服务能力不强，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往往难以拓展。因此，科研能力不强已经成为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的瓶颈，亟待突破和创新。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机制还停留在比较局部、浅显层面，合作深度明显不够。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追求的是生产和经营利润，学校追求的是培养人才的质量。如何避免在校企合作中由于企业的逐利行为、短期行为给学校带来人才培养的急功近利的不利影响，保证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等，都是职业院校跨境输出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跨境输出存在跟风以提升影响力现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较多，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意味着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面临着较多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风险。要使职业教育跨境输出顺利进行，必须要对输出目标国家的职业教育、经济水平、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等有比较深入的理解。目前，一些职业院校出于学校影响力提升，进而能争取到一些项目和成果的考虑，纷纷尝试走出去，但由于前期经验比较缺乏，对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缺乏深入研究，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以致在境外输出过程中一些项目流于形式，收效甚微。譬如境外办学，举办仪式后，后续发展往往不能按照规划的进程执行，甚至一些境外办学点在后续出现关闭或停止招生等，造成不利影响。

四、对中国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建议

（一）融合办学地方特色，坚持文化自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俗习惯、民族信仰等方面与中国存在着不同之处，中国职业院校跨境输出过程中将面临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冲突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差异关系到职业院校境外输出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职业院校境外办学能否被当地国家接受。为促进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特别是境外办学的顺利进行，并在这一过程中彰显民族自信和国家实力，一方面，职业教育跨境输出要恰当融入当地社会，对当地文化选择性接受；另一方面，在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时要强调文化自信，注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让目标国家受众更好理解中国，理解职业教育引进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注重推进汉语教学工作，通过汉语的普及，积极宣传和贡献我国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面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提升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情感，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样既有助于职业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也有助于培养的人才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相匹配，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职业院校培训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常态化输出，拓展国际市场，塑造职业教育认同，助推职业教育融通，增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二）多校企协同跨境输出，增强办学实力

职业院校在境外办学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问题，既要熟悉当地的情况，也要具有雄厚的办学实力支持，这涉及师资领域、技术领域、资金领域等。为有效推进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顺利进行，职业院校可以联合其他职业院校、本科院校和一些科研院所，并协同相关企业，集中各方优势资源，联合输出，不仅能增强跨境输出的实力，减少跨境输出中的困难，也可以实现共担风险和有效抵御风险。同时，由于部分在境外投资企业和一些院校对当地比较熟悉，具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人脉，通过信息共享，可以让其他职业院校跨境输出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并且也使输出的专业和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契合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需求。在联合推进时，可以采取一企多校或者一校多企或多校多企联合跨境输出模式，也可以在现有企业海外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办学升级，这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而定。

(三) 多维度架构跨境输出支持机制

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推进需要完善的机制来保障。

一是建立高端智库，专门研究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情况。包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情况，为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提供智力支持，提前做好应对举措。

二是构建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经费支持机制，拓展经费筹措渠道。如争取相关国内外金融机制的支持，获取一些基金组织和银行，如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亚洲合作资金、中非合作基金等的大力支持，多渠道获取跨境输出专项资金。

三是建立职业教育与其他援外政策互通的支持体系。如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与技能培训对外援助体系的融合，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与文化输出体系的融合等，切实拓展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途径。四是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跨境输出产教融合的企业补偿机制，加快构建模板化与适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标准体系，推进职业教育跨境输出高效发展。

(四) 系统化构建跨境输出评价机制

为促进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顺利进行，需要架构职业教育向“一带一路”跨境输出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需要构建四方面机制：

一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可行性评价机制，即职业院校跨境输出前，需要就输出的项目基于办学实力、专业水平、师资队伍情况、校企合作经验、大型项目承接经验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并设立合格标准。

二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运行评价机制，即职业院校跨境输出的项目要定期接受专家组评估，专家组成员应由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高校教师组成，对于评估中的问题要求督促定期整改。

三是“中高本”职业教育跨境输出的协同机制，即考虑到中国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机制的打通，在向“一带一路”跨境输出时也逐步需要融入“中高本”职业教育衔接问题，这样既可以满足国内企业境外发展需求，也符合东道国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四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改进机制，是指要根据国际产能合作需求，建立适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改进机制，适时改善人才培养模式或办学机制及专业设置，譬如设立数字经济类专业等，以更好服务于国际产能合作。

四是职业教育跨境输出改进机制，是指要根据国际产能合作需求，建立适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改进机制，适时改善人才培养模式或办学机制及专业设置，譬如设立数字经济类专业等，以更好服务于国际产能合作。

摘自：《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22期

作者：李富、王湘蓉，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王燕苹

非凡十年·广东答卷 | 四所中外合作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有助于加快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的目标。中外合作大学经过多年努力，以优质的办学成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优秀学子报考。自成立以来，广东省四所中外合作大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师资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等诸多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奋力书写中外教育合作的精彩答卷，为各领域合作与广东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下文将转载广东省四所中外合作大学的经验分享：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

全球聘用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与学科发展建设

全球聘用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建设这所国际化大学的关键，目前学校已引进500名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5名、各国院士近30名、国际专业技术协会会员48名、国际期刊主编/副主编32名，100%具有在国际一流大学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学校秉承和发扬香港中文大学的优良学术传统，适应珠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结合国际学科发展趋势，学科建设注重交叉新型学科和前沿基础学科的发展，在经济与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未来智能网络、生命健康、新材料和能源科学等领域已组建世界级专家队伍，正在面向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打造国际化科技创新平台。

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国际合作创新项目

大学学术交流处与合作伙伴开展多个创新型国际合作项目，为学校师生提供类型丰富多样的交流学习与科研资源。面对疫情带来的多重挑战，在有关部门与各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港中大（深圳）国际交流与合作稳步前行，持续服务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截至目前，大学已与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30所一流大学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开展形式丰富的合作项目达到228个。合作院校包括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近年来新增的合作伙伴包括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韩国高丽大学、英国杜伦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等。自2020年以来，已与22所合作院校共同开发新项目30个，合作内涵更加丰富，交流层次日益提升。

本科毕业生去向成绩斐然、亮点纷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发布2021年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在持续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第四届本科毕业生去向成绩斐然、亮点纷呈，在世界顶尖名校认可度、就业平均薪酬等方面纷纷创下历史新高，就业率在内地高校名列前茅。该校2021年本科毕业生超七成选择继续深造，就业的毕业生平均年薪再创新高，达到16.26万元。

该校第四届本科毕业生去向呈现以下五大特点：

一、总体就业率为95.52%，在复杂的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下，毕业生的质量依然较去年稳步攀升、保持高位稳定；

二、学生去向呈多元化趋势，超过70%的毕业生继续深造，入读遍布世界各地的顶尖名校；25.03%直接就业，就业单位覆盖国企、民企、外企、事业单位等各领域；0.46%的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

三、受全球变局和疫情影响，升学地区也呈现多样化态势。美国仍然是毕业生首选，占升学总人数的33.77%；在中国香港和本校深造人数显著增长，分别占19.18%和15.57%；前往英国深造的毕业生占比12.62%；七成选择继续深造，升学毕业生中，70.98%攻读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名校硕士/博士学位，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苏黎世联

邦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四、70.98%的升学毕业生攻读世界排名前50名的名校硕士/博士学位，攻读世界顶尖名校比例再创新高，彰显了海内外知名大学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子极高的认可度；

五、就职于企业的毕业生中，超过70%入职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上市企业或跨国企业，花旗集团、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中金公司等雇主对毕业生培养质量非常认可。



《《《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

创新育人模式：稀缺性复合型人才培养结硕果

深北莫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将“设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写入章程，设立党委、纪委及基层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已培养发展99名学生党员，50%以上中国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同时，将思政课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开展各类思政教育主题活动，着力构建“大思政”格局，获得深圳市思政教育示范校、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等荣誉奖项。六年砥砺前行，深北莫已建立起从本科到博士的多层次学历教育体系，并获批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021年进入广东省新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4个学科入选省重点建设学科；2020—2021年4个本科专业先后入选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做实发展内涵：服务国家及区域创新发展显潜力

经过六年的发展，深北莫已组建由俄罗斯知名学者、国际学术大师领衔的高层次学术团队，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学术卓越、结构合理的一流国际化师资队伍。84%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75%以上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外籍院士8名，全球2%顶尖科学家1名，“国家青千”2名。俄籍教师占学校教师人数的50%以上，其中莫斯科大学选派330人，全球招聘118人，生师比小于10:1。

紧密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所需，深北莫目前已建成应用纳米光子学平台、分布式智慧能源产业应用实验室、航空内燃机性能实验室、集群智能国际创新实验室、先进互联与异质集成实验室、新型电池材料研发实验室、智能无人系统联合实验室、智能制造实验室等8个科创平台，设立计算数学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前沿交叉技术研究中心、中俄法学比较研究中心(深圳市社科重点基地)。正在推进化学与材料联合研究中心、放射化学与放射生态学科教学中心、现代生物学前沿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欧亚研究中心、中俄教育比较研究中心等基础学科研究、技术创新及人文社科平台建设。

坚持开放办学：中俄文化教育科技共融合

从俄罗斯传统“知识节”，到定期举办的“莫大院士大讲堂”“俄罗斯茶”等数十项中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从2021年9月成为文博会唯一高校分会场，以“印象俄罗斯”为主题开展12大板块27项活动，到常设“中共六大”“留苏百年”“俄罗斯油画”等主题展览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中俄优秀文化，当好中俄文化传播使者，助力中俄合作交流。

近两年，深北莫还承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材料专题研讨会、上合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平行论坛，举办“探索与合作”中俄数学研讨会、反演问题计算方法及其应用国际会议、“罗蒙诺索夫”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等20余场国际学术会议，助力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

建校以来，俄罗斯政界、教育界、体育界、企业界20余个代表团来访。同时，还与俄罗斯鲍曼技术大学、俄罗斯联邦政府金融大学、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俄罗斯系统金融股份公司等10多所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设立俄语测试中心、汉语考试考点，组织对外俄语水平等级考试、汉语水平考试。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际联合学院 (UIC) >>>

办学实践彰显中国特色

中外合作办学的特色是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所用”。为了做到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汤涛校长提出首先是要立足本土、立足中国国情。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早期直接移植境外校方的管理模式，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需要一个磨合、理解、适应的过程。其次，中外双方都要有开放包容的姿态，尊重各自的理念，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这样才能实现办学模式的完美融合。最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要基于在中国实施国际化教育的语境，挖掘自身的办学特色。以UIC为例，与多数研究型大学不同，我们致力于建设一流的博雅型大学，体现在我们既重视育人，使学生思想活跃、善于学习，具备深耕专业领域和跨学科发展的能力，同时积极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开展思政课的新途径，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在爱国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形成全球视野和卓越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UIC一直致力于建设新型博雅型大学。一是教育理念新。博雅型大学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威望，其特点是以学生为本，师生互动多，讲求文理兼通，注重学生心智的开启与扩展以及人格的培养与塑造，全方位关注学生身心成长。博雅教育是由西方舶入的概念，在中国的实践中需要作适当的改良。在这方面，UIC在近17年的办学历程中做了有益的尝试，即在博雅教育、全人教育和国情国学教育课程中，大量且有系统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收效十分显著。二是管理模式新。颁授的是香港浸会大学学位，学术质量保障体系严格、接轨国际，同时注重吸收中国育人传统理念，凸显新时代中国教育要求和特色。可以说，新型博雅型大学融汇中西、贯通古今，致力于培养“博文雅志、真知笃行”的人才。

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UIC近年来新增了7个专业，涵盖文理、艺术等类别。新增专业主要是考虑社会和产业的发展对相应人才的需求，其次是考虑学校自身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比如，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是个强势兴起的交叉学科领域，急需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高水平专业人才。再比如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是基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际需要、基于国际化大学的资源优势开设的，有助于在新的国际格局下，培养拥有中华文化深厚根底和国际学术视野，具备中英文沟通技能，具有良好理论素养与实践运用能力的中国文化传播者，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一份力量。

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让人们深刻意识到教育不能只培养当下的专业人才，更要着眼于未来。我认为，未来的人才应该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包括独立思考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不仅能熟练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也要对其他学科领域有所涉猎。所以学校一直倡导，让理科生学习哲学、文学等，让文科生接触数学、商科等，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保持好奇心，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牢牢抓住人才培养根本

一所大学，科研很重要，创新很重要，但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把上好课、做好培养学生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才是大学教育的本质。学生不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而应在德育、体育、心智、美育等方面均衡发展，这样走入社会后才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和竞争力。2021届落实去向的毕业生中，选择出国出境升学的占82%，全球百强名校输送率约81%。在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的大环境下，这份毕业生“成绩单”来之不易。这说明学校的博雅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国际高等教育界认可，这离不开学校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一直在帮助学生挖掘多方面的潜力，使他们既有扎实基础，又能多元发展，具备更强的可塑性。

得益于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学生既有全球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看待事物更加全面；同时，学生有很积极的人生态度，敢于创新，敢于直面挑战。我观察到，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生留学后绝大部分都会回国，为祖国各行各业发展贡献力量，这也体现了中外合作办学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

“创新”的种子在研究型大学深深扎根

建设成为一所具有国际公认高水平教育、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大学，是建校初始定下的目标。为凸显“研究型”的定位，广以在很多方面进行了规划和建设。

在招聘教师上，学校以较高的科研标准招聘教师，不仅要求教师在教育、研究和创新三个方面同时扮演重要角色，更强调充分发挥三方面活动所产生的协同优势。广以60%以上教师由以色列理工学院派出，其他教师遵循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术标准，在全球进行招聘。在广以，教师既要成为发现新知识、创新思维和方法的活跃研究者，也要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创新，成为学生的榜样。

为给开展实践教学和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有力保障，广以持续购进世界一流水平的实验仪器与设备，目前，北校区已建成分析化学实验室、环境工程实验室、微生物工程实验室等大型教学实验室，以及绿色催化化学实验室、环境可持续性实验室、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核心实验室等49个科研实验室。

据了解，2018年，成立只有两年的广以就被列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成为入选该项计划最年轻的高校。去年，该校又新获批广东省重点基础研究项目，新增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有了更加良好势头。

“广以给我带来了科研启迪和方向指引。”广以2017级学生曾育颖本科毕业后选择留在广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谈及这一选择，他说上高中时，他对未来有很多想象，但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走上科研这条道路。来到广以之后，曾育颖接触了许多有趣的课程，慢慢地对科研产生了兴趣。去年10月，他在“金湾杯”第八届“创青春”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上，和团队成员凭借“蝗虫蛋白质提取”项目获得奖项。

作为广以首届本科生，曾育颖与学校共同成长，携手同行，并通过不懈努力，交出人生征程上一张靓丽的“成绩单”。获悉，在广以，学生们不但掌握了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科学思维方法，而且深刻领略了以色列理工学院独具特色的创新创业理念，也逐步养成了“不留下任何空白”科学素养、“容许自己失败”的人生信念。在曾育颖看来，四年的广以学习生活，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重塑了自己。

资料来源：南方日报、汕头日报、汕头融媒集团、中国教育报

作者：孙颖、沈泓涵、张银荣、嘉嘉、韩晓萌

责任编辑：黄欣丽、王燕苹

「国内视野」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首届学生开学典礼并致辞

9月1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届学生开学典礼在广州南沙举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频方式致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广东省省长王伟中现场出席活动并致辞。

怀进鹏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全新蓝图，引领港澳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中，教育勇担使命，努力贡献最深厚、最持久、最磅礴的前行力量。教育部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开放新高地，推动内地与香港教育领域交流合作日渐丰富、日益深化、日趋活跃。设立内地与香港合作大学，在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也是教育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建设的具体体现。

怀进鹏指出，面对相互交织的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将立足时代，面向未来，以开放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以教育数字化推动教育生态转型，以教育的发展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怀进鹏对学校的建设发展及教师、学生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学校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胸怀“国之大者”的人才沃土，担当粤港澳科技创新的智慧引擎，搭建内地与香港青年交流的桥梁纽带，努力成为扎根中国、融通粤港、面向世界的新时代合作大学的标杆和典范。

二是希望老师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先进的教育理念，传道、授业、解惑，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启发学生智慧，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大先生”。

三是希望同学们珍惜美好年华，勤于学习，敏于求知，锤炼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成为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于2022年6月14日经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由广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举办，开展本科和硕博士层次教育，2022年首届招收学生近600人。

来源：教育部官网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9/t20220901_657295.html

责任编辑：王燕苹、黄欣丽

「国内视野」

香港与内地高校合作共融共赢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日共同举行合作备忘录线上签署仪式。两校计划进一步深化学生培养及交流项目，并借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今年9月的正式启用，携手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贡献力量。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在高等教育领域优势互补，合作效果良好，对彼此都有利。希望未来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研究资助局主席黄玉山对记者说。

一、合作潜力大

在合作备忘录线上签署仪式上，港科大和中科大组织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等代表参加会谈，展开深入战略合作探讨。港科大（广州）副校长吴景深说：“港科大（广州）与中科大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希望能面向未来布局，在合肥—广州—香港‘三地一体’开展多维度科教合作，推动两校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港科大与中科大拥有悠久的合作历史和深厚的科教合作基础。当下正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学校‘双一流’建设关键期，要不断推进港科大—中科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建设，不断探索合作新思路、创新合作模式。”中科大副校长杜江峰说。

为进一步加强与内地高等院校的合作，香港浸会大学近日与内地18所大学共同举办“共融共赢，再启新程”校长论坛暨“香港浸会大学与内地一流高校合作签约仪式”。内地这18所大学包括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活动回顾了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浸大与内地高校不断深化合作、共融共赢取得的成果，并对浸大未来与内地高校在教学科研及师生交流等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进教育创新发展进行展望。

浸会大学校长卫炳江说，浸大首次与内地多所大学同时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浸大与内地院校合作的新里程。教育要面向未来，浸大也期望与内地大学携手，为国家培育一代又一代能够迎接未来挑战的跨学科人才。

二、联盟优势强

近年来，“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相继成立，三大联盟对促进香港和内地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也对两地科研发展产生双赢效果。去年底，由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及澳门大学三校共同牵头创立的“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也正式成立，33所高校加入联盟，包括江苏省21所、香港9所、澳门3所。

“作为教育大省，江苏与香港、澳门两地高水平大学的交流合作一直非常紧密，校际合作很多，各方都希望以联盟的形式，继续发挥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对接和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南京大学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晓蓉说。

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将推动形成若干个专业学术联盟，首批包括拟由南京大学联合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推进的“天文学与行星科学专业联盟”，河海大学联合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推进的“能源电气学科发展专业联盟”，中国药科大学联合香港大学、澳门大学推进的“苏港澳大学医药专业联盟”等。

今年6月，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江阴实践基地正式启动。李晓蓉说：“我们主要发挥苏港澳三地的高校科技创新和人才的优势，将来可以依托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江阴实践基地开展港澳青年的实习、实践、创业活动，还有人才的互动交流。江阴的企业众多，科技创新的资源 and 需求很大，我们在科研方面的深度合作也会为企业的发展、技术的转化做服务。”

三、湾区东风劲

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东风，香港高校在广东越发有“遍地开花”的趋势。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在珠海已落地生根，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香港理工大学在佛山、香港都会大学在肇庆、香港大学在深圳等合办高校也在建设或筹建中。

根据《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广东将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国际化高等教育资源聚集高地。到2025年，新建3—5所粤港澳合作办学机构，新设3—5所不具法人性质的合作办学机构和联合研究院。

港科大（广州）已确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6个发展领域。未来港科大以传统学科为主，港科大（广州）则以跨学科为主，将秉承“双校互补”的建设理念，增进两所校舍交流、互动与合作，携手创造更多成果。“我们要培养适应未来科技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高端人才，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说，两校将构建灵活、互补、学科不重叠的全新学术架构，学生除了可以跨校选择导师、修读课程外，也可共享实验室及科研设施。“深圳校园是香港大学的2.0版，贡献大湾区、服务国家、放眼世界。”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希望通过在深圳建校，将香港优越的教育资源、基础研究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并努力推动大湾区经济和科技融合。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7-14/9802960.shtml>

责任编辑：王燕苹

制胜全球：英国国际教育战略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建构（节选）

本文以英国国际教育战略的历史演进为始发，继而评述当前的战略重点与保障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的相关实践。

当前英国国际教育战略的重点

1. 教育产业输出

目前，跨境高等教育仍是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主要领域，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战略都主要围绕“建立国际教育中心”“吸引留学生”“建立海外分校”“输出项目与课程”等重点领域展开。更长远地看，全球教育最有潜力的市场将分布在儿童早期发展、国际学校、技能培训和智能教育技术等领域。谁先在全球范围内占据这些教育市场，谁就能赢得未来国际教育战略的主动。

从新战略的内容中不难看出英国政府对这种趋势的回应。国际贸易部与教育部达成共识，要全面推动早期教育(Early Years)、独立学校(Independent Schools)、语言学习、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教育技术走向国际市场，且承诺政府会向企业和学校提供更大支持，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教育贸易中的绝大部分收益仍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其他教育产业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而言，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开放程度低于高等教育，这意味着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高。对企业 and 学校来说，虽然国际市场充满机遇，但海外投资与经营风险巨大，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走出去”。为此，英国政府决定集合国际贸易部、教育部、文化教育协会及教育产业内的资深行会与领军企业，共同实施推进教育产业整体输出的战略举措。这些措施既有明确的政府责任主体，也有具体的活动内容，主要目的是激励、动员、支持和协调教育行业向海外扩展。

表 1 推进教育产业输出的战略举措

| 产业领域 | 主要负责的政府部门 | 采取的具体行动 |
|------|-----------|--|
| 早期教育 | 国际贸易部 | 国际贸易部同本土早教产业联盟(Early Years Alliance)紧密合作，通过行业会议、工作坊等形式分享国际早教市场的动态；国际贸易部会向本土早教机构分享国际市场信息，设立海外据点，向它们提供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与开发的资源。 |

| 产业领域 | 主要负责的政府部门 | 采取的具体行动 |
|-----------|------------------------|---|
| 独立学校 | 国际贸易部 教育部 | 国际贸易部会为投资者与办学机构牵线搭桥，寻求海外办学机遇；教育部与国际贸易部合作，推进英国学校海外调查计划。 |
| 语言学习与培训 | 国际贸易部 文化教育协会 | 国际贸易部会同语言学习与培训行业合作，鼓励更多机构向海外发展；从2019年开始为语言培训机构提供参与大型国际项目的机会。 |
| 跨境高等教育 | 教育部 国际贸易部 文化教育协会 | 重新评估跨境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与潜在市场中的政府进行对话，消除海外贸易障碍，促进学位学历互认；政府间多部门合作，为英国高校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 |
|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 国际贸易部 教育部 | 为更多的技能培训机构提供国际项目、贸易补贴和专业指导，鼓励它们赴海外招生；利用政府间以及产业间的伙伴关系，推进英国职业技术教育品牌走出去。 |
| 教育技术与装备 | 国际贸易部 | 激励本土教育技术供应商更多关注海外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利用“卓越英国课堂”推广英国的智慧教育，同时打造创新型的多媒体平台向海外介绍本土先进的产品与设备。 |

相较于2013年的国际教育战略，英国政府此次更为强调海外市场的战略布局，主要目的是调和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关系，推动教育产业有方向、有重点地“走出去”。为此，英国计划搭建更为全面的国际教育支持与服务体系。在境内，国际贸易部教育事务办公室、文化教育协会及区域贸易顾问将构成政策咨询平台，为海外教育投资、出口、合作提供专业服务。在海外，英国派遣至全球108个国家的贸易专家以及设立在168个国家的外交驻点将同文化教育协会一起构筑服务网络，保障英国人在国际教育活动中的权益。这种咨询与服务机制是对海外市场进行优化布局的重要方式。为企业或个人从事跨境教育贸易提供信息与咨询，不仅能有效避免投资与运营风险，还有利于将这些海外教育贸易引向英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区域。

整体上，新战略将英国国际教育的海外市场划分为重点区域(High-Value Region)和潜在区域(Potential Growth Region)两类。重点区域是指那些能够为英国教育提供更多发展机遇的国家或地区。新战略认为，从跨境教育贸易的角度看，所有海外重点区域应具有如下特征：当地政府将教育和科研投资作为重点；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对高质量的学习体验有强烈需求；经济发展更依赖技能、知识和服务的多样化。目前，英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四个

主要的高价值区域，包括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中东与北美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及东盟成员国。这些区域不仅经历教育改革，而且有稳定增长的教育需求，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潜在区域的教育市场虽未成熟，但可待挖掘的资源与利益巨大，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重点市场”。在新战略中，英国政府将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印度及中亚等国家或地区列为重要的潜在区域，主要依据是它们在未来10—20年中会对教育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同时也会产生更多具有优质教育需求的中产家庭。“潜在区域”概念的提出表明，英国已经在海外市场的战略布局上形成更长远的构想和规划。

此外，新战略也强调海外教育市场的布局须依循英国出口贸易战略(Export Strategy)所设立三条标准，即“国际机遇”“本土能力”“国家整体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海外教育市场的选择有必要考虑以下因素：准备进入的地区是否存在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英国教育产业能否满足当地的需求；教育贸易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2. 教育品牌推介

英国历来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品牌建设。通过 British Council、BBC、Global Britain 等平台，英伦文学、影视、摇滚乐的影响力遍及全球，而剑桥、牛津、朗文等出版商则长期占据着英语学习领域的核心地位。这些世界性文化品牌使得不列颠的国家形象与文化品质深入人心。在2018年波特兰全球软实力30强(Soft Power 30)排名中，英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高居榜首。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教品牌的国际推广。

尽管英国教育品牌已经建立起很好的国际认同，但现实挑战依然严峻。一方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教育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严重影响着英国的扩张；另一方面，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太地区新兴国际教育中心的吸引力逐渐增强。这些因素正在削减英国教育在全球范围的吸引力。面对新的教育全球化格局，英国提出以国际推广为核心的行动方案，试图改善海外教育活动的统筹与协调，增加对重要项目的投入。例如，英国外交部门将卓越英国教育(Education is GREAT)纳入“卓越英国计划”(GREATE Britain Campaign)中，每年拨付数百万英镑专项资金，通过驻外使领馆以及文化教育协会海外办事处向外国公民推介赴英留学信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是“留学英国：发现自己(Study UK: Discover You)项目。它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国际学生订制属于自己的英国留学信息，解答奖学金、课程选择、学业规划、生活安排、毕业后实习机会等一系列问题。目前，该项目已经在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推行，是英国教育国际推广的重要平台。未来，英国政府还会为该项目追加500万英镑资金，将其打造成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育技术等在内信息发布媒介。

新战略也明确指出，海外推广的关键已不再是向更多年轻人介绍英国教育，而是让已经获取信息的家长与孩子更深入地理解英国教育的专业性、多样性以及独特魅力，这需要长久有效的“扎根”。因而，有必要在某些国家或区域选拔有影响力的人物和组织担任英国教育的海外“代言人”，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所在国本土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为英国教育输出寻求更多机会，以及向政府汇报海外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障碍”。

3.国际学生招收

英国将国际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英国境内(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 各类学校或教育机构注册就读的外籍学生；另一类是在英国跨境教育机构或项目(主要为海外分校和各类国际合作项目) 中学习的外籍学生。这两类学生每年为英国教育产业带来的经济价值高达数十亿英镑，对国际教育战略意义重大。为吸引更多国际学生赴英留学，英国政府提出两项重要举措。一是改进原有的签证政策，放宽对留学生的入境管控和就业限制。从2019年开始，凡符合英国入境基本条件的留学生，只要录取院校招收，相关部门不得以其他理由拒签。来自国外的硕士研究生从英国高校毕业后，仍能无条件地停留6个月，而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在离校后可免签停留12个月。在此期间，他们的实习与工作不受任何限制，英国政府也会尽可能安排他们进入与自己专业域相应的行业。二是增加奖学金项目的投入。英国大学费用高昂，令不少国际学生望而生畏。新战略特别提出，在加强原有“马歇尔学者计划”“英联邦奖学金”“查伟宁奖学金项目”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更多高校对优秀留学生进行资助。

从2010年起，英国开始有意识地将招收第二类学生作为本土留学教育的替代策略，加大对海外分校与国际合作项目领域的投入。目前，已有80%的英国高校参与跨境教育，在海外招收学生超过75万人，远远超过在英国本土就读的留学生，但是英国也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运行跨境教育项目的风险很大，必须积极适应各国内部的教育改革趋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入跨境教育市场，国际生源的争夺正变得空前激烈。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大学委员会(Universities UK)、英国院校协会(Guide HE)、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 共同发起全国性协商活动，集中讨论了未来扩展跨境教育的战略方向。英国高校普遍认为，声誉和质量是影响跨境教育招生最为关键的因素。因而，海外项目招生应立足两点：一是充分开发国际合作办学品牌的价值；二是建立更为有效的质量监测框架。

1. 制定教育贸易的原则

将国际教育作为贸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产业与市场的逻辑规划教育输出是英国一贯秉持的理念。在政府看来，教育输出本质上是一门“生意”，其最大的价值是获取经济利益。因而，应立足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基本结构，对国际教育战略进行建构。这种强烈的贸易主义倾向同近30年来英国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与资本化的趋势有着密切关联。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英国教育体系的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学校与政府的行政联系削弱，市场与资本深入教育领域。伴随全球市场的快速增长，英国本土企业与学校向海外扩张以谋求更大利益的欲望不断增强，国际教育成为它们进一步积累资本的重要方式。自WTO将国际教育定义为服务贸易以来，自由贸易协定及相关的市场规则逐渐成为各国规范跨境教育行为的制度基础。英国也意识到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并充分利用各种经贸协议发展跨境高等教育。

在贸易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英国政府提出，未来会根据2018年国家出口战略(National Export Strategy)所提出的基本原则规范国际教育的发展。一是向教育产业提供财政支持，扶植本土企业“走出去”。国际贸易部将通过直接贷款、贸易信用机制、政策性补贴等方式向教育行业提供政府出口资金，也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和学校的海外扩展提供其他融资手段。二是培养本土教育行业的全球化意识，激励更多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部已将教育纳入“出口贸易冠军”(Export Champion)计划中，遴选教育贸易中的卓越代表作为行业领头羊，并予以实质奖励。三是提供更为强大的国际教育信息资源及专业咨询服务。例如，英国政府决定，从2020年开始定期发布评估教育出口产值的官方报告，评估教育服务贸易的总体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寻求国际市场机遇提供准确的信息。

2. 强调海外支点建设

英国的国际教育战略具有典型的外向性特征，强调从本土向境外的教育输出。因而，相较于其他国家，英国更为重视海外支点建设，并将其作为扩展与深化国际教育的主要途径。事实上，从二战后皇家宪章赋予文化教育协会运营权开始，英国一直在有意识地拓展海外支点的功能。一方面，它作为跨境教育贸易的前哨，搜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并长期同当地政府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英国企业与学校的海外基地，为它们的投资、经营、合作活动提供资源和服务。

新战略希望海外支点能够为国际教育发展提供一个全球网络，使境外教育活动拥有强大的支撑。以英国经营多年的文化教育协会为例，该组织的办公机构分布于全球六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雇用员工12000余人，构成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教育服务体系。任何有意在国外进行教育投资、创业或合作的英国公民或组织，只要支付一定费用便可享受国际教育市场营销(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rketing)、市场机遇测评(Opportunity Assessment)、伙伴关系构建、展会设计与组织、品牌推广与维护、培训与专业发展等服务。英国政府提出，在文化教育协会已有全球网络的基础上，扩展国际贸易部、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的职能，构筑更为强大的教育贸易海外服务体系。新体系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第一，负责搜集与分享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教育信息。尤其是具有商业与贸易价值的情报与数据。这些信息会让英国对全球教育市场动态的把握更准确。第二，对接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体系，使知识、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第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从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为英国寻求新机遇。

3.推进整体政府模式

推进国际教育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国际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要依靠教育部、国际贸易部、国际发展部、外交部、财政部等行政主体间的相互合作，还同国家层面的文化外交、科学合作、国际移民等战略紧密关联。除此之外，参与跨境教育的企业或院校也需要大量政策支持，以简化注册、审批、融资等程序，获得更好的培训与咨询服务。这些均需要在国家层面对政策、组织、资源与信息等因素进行整合。

为此，新战略提出构筑“整体政府”(The Whole of Government)的模式，以消除国际教育政策与服务的边界。所谓整体政府，就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协调、整合与问责为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问题进行有机协调，充分体现国家治理的包容性与整体性。这一理念于1999年被写入英国《现代化政府》白皮书中，随后迅速推广至众多经合组织国家。就国际教育而言，“整体政府”理念主要体现在两项改革：一是鉴于外交与英联邦办公室、国际贸易部、文化教育协会、国际发展部及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部等部门在英国的海外贸易、全球影响、伙伴关系构建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决定在它们之间成立一个跨部门、高级别的国际教育领导小组(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eering Group)，负责政府内部相关组织的联络与沟通；二是在国际贸易部和教育部间筹建教育行业高级咨询小组(Education Sector Advisor Group)，构建政府组织与教育行业间的伙伴关系，以此推进新战略的实施。“整体政府”模式为英国的国际教育构造了一个以国际贸易部为中心的运行体系，它融合了推进教育产业整体输出所需要的制度、资源、信息与服务，使英国本土教育体系对国际市场的反应更迅速、更高效。

构建更为完善的国际教育战略是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入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必然选择。当前，扩大教育开放正朝着更广泛、更深入、更多样的方向发展。我国已初步实现建成亚洲国际教育中心和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的目标，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如何定位教育国际化，使之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趋势，仍会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英国国际教育战略历史与现实也许能为我国带来以下三点启示：

1. 充分发掘国际教育的产业价值与贸易价值

当前，中国教育“走出去”仍以人文交流与对外援助为主要模式，强调政治与文化意义，教育产业输出的规模与效益不甚显著，但应该看到，近年来扎根在语言学习与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早期教育、课外补习与辅导、智慧教育技术、艺术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的一批本土企业在国内教育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壮大。它们既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带来税收的增长。如何帮助本土企业与学校“走出去”，通过国际贸易形式进入海外市场，是我们在未来应该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2. 着力完善国际教育的体制机制

从体制上看，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定位主要参与者的角色与关系，即确认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推进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权限、责任和作用，以及在各种行动中如何相互支持与合作；从机制上看，国际教育也需要一整套资金投入、沟通协调、质量问责、风险预警的机制，保证输入与输出、境内与境外各种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与利用。

3. 积极扩展国际教育的海外影响

中国教育能否产生深入而持续的国际影响力，除了本土教育自身的质量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认同。这需要我们主动“走出去”，甚至长期扎根在国外环境中。若要实现这个目的，一方面有必要充分挖掘与利用驻外使领馆文化教育处、商务部驻外经销处、孔子学院、跨国企业的海外研究中心等现有平台的支点作用；另一方面，应有意识地强化中国教育的海外品牌建设，将富有影响力的知识、技术、产品、服务、制度转化为中国模式与中国故事。

摘自：《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年22期

作者：孙志远、王洋

责任编辑：王燕苹、黄欣丽

疫情背景下美国一流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一、制度保障

(一) 目标使命: 安全为首、卓越为要

疫情当前,美国一流大学根据现实困境,对学校发展目标与使命进行相应地调整,既有对长期愿景的坚守,又突显危机中的管理应变能力。重整之后的目标与使命(表1),为一流大学各部门职责坚守、举措实施提供了方向指引。

表1 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的目标与使命

| 序号 | 大学 | 目标与使命 |
|----|--------|--|
| 1 | 哈佛大学 | 优先保证全体成员与社区的健康与安全;阶段性地恢复校园;确保教学、学习、研究继续保持最高水准。 |
| 2 | 斯坦福大学 | 保障全体成员的健康与安全;逐步恢复校园正常教学生活秩序;提供最佳的教育体验(包括富有吸引力的在线教育);保证学生的教育质量全速向前发展。 |
| 3 | 麻省理工学院 | 保护全体社区的健康与安全;阶段性地恢复校园;履行学校教学与研究的使命;确保学生保持学业进步,提供卓越的教育体验。 |
| 4 | 加州大学 | 维护校园安全与健康;阶段性地恢复校园;关注和重视学生的教育质量。 |
| 5 | 普林斯顿大学 | 保护社区的健康与安全;分阶段地恢复校园运作;忠于教学与研究的使命;提供最好的教育。 |
| 6 | 哥伦比亚大学 | 实现社区最高程度的健康与安全;竭尽全力地继续学术研究与教育的使命;努力发展学生智力;逐步有序恢复校园授课等活动。 |
| 7 | 加州理工学院 | 优先保证社区成员的健康与安全;确保教师继续开展最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确保学生教育的成功与卓越;阶段性地恢复校园。 |
| 8 | 芝加哥大学 | 保证社区的健康与安全;继续保持教育与研究这一核心工作;阶段性地恢复校园。 |
| 9 | 耶鲁大学 | 捍卫校园和社区的健康与安全;疫情期间教育、研究、教学的使命重于任何时候;提供独特、变革性的教育;逐步恢复校园教育教学秩序。 |
| 10 | 康奈尔大学 | 维护学生和社区的健康与福祉;竭尽所能支持学生完成教育,并确保成功与卓越;寻求新的方法继续教育、研究、教学,恢复原来的水准;阶段性地恢复校园。 |

(二) 组织机构: 各司其职、协同保障

在继续保持卓越质量的共同使命引领下, 美国一流大学开展多组织与机构深入协同合作, 共同构建灵活管理、资源供给、技术保障、教学与服务支持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图1)。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内部学术质量保障与协调由教务长(Provost and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总负责。学生教育办公室 (Office of Students' Education)与学生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Students' Affairs)则教务长的统领下分别负责学生在校学习与其他各项事务, 同时兼有对信息技术中心、教与学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财务援助中心、图书馆等部门进行职能协调与业务反馈的责任。以上职能部门则具体地对教学运行、学生学习、教师教学进行服务支持(表2), 保证教学质量。美国一流大学各部门机构在职责上比较明确, 各司其职但并非各行其是, 总体上是相互协助、相互包含、合力支持的网络协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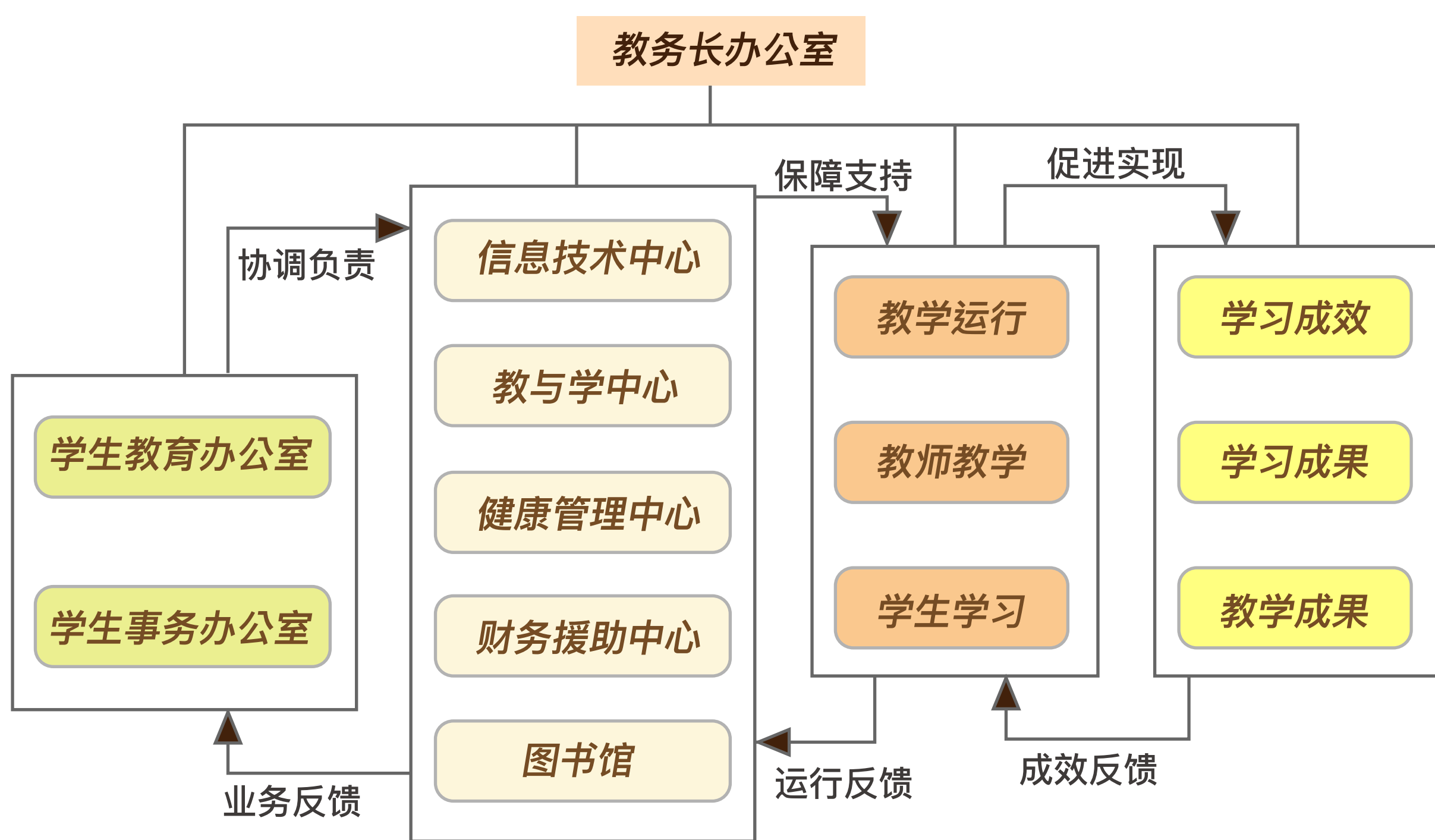


图1 疫情背景下美国一流大学教学质量保障支持框架
(资料来源: 根据10所大学公布的官方应对信息整理。)

表2 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教学保障协同部门及其针对性任务

| 工作职能 | 及其针对性任务 | | | | | |
|--------|---------|--------|-----------------|--------------|---------|--------|
| | 协同部门 | | | | | |
| | 信息技术中心 | 教与学中心 | 健康管理中心 | 财务援助中心 | 图书馆 | |
| 学习支持服务 | 软件资源提供 | 学习资源提供 | | | 信息资源数字化 | |
| | 软件学习资源 | 远程学习指导 | | 资金援助 设备援助 | 学习资源提供 | |
| | 技术保障 | 学业咨询辅导 | | | 远程协作学习 | |
| 教学支持服务 | | 教学资源提供 | 身心健康咨询 预防与医治 | | | |
| | | 远程教学支持 | | | | 教学资源提供 |
| | 技能培训服务 | 教学咨询支持 | | | 经济困难援助 | 远程协作教学 |
| | | 交流合作支持 | | | | |

注: 加粗内容为学习支持和教学支持共有的任务。
资料来源: 根据10所大学公布的官方应对信息整理。

(三) 组织教学: 灵活管理、高效优质

受疫情影响,美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比较复杂,采取了线上授课、线下授课、混合授课等方式,同时学位答辩、学业评价等一系列培养工作也转为线上开展。为此,美国一流大学积极探索最优化的教学模式,致力于达成卓越教学质量的目标使命。其中以哥伦比亚商学院的HyFlex的教学模式最为典型。HyFlex模式旨在将“混合”和“灵活”相结合,面对面(同步)和在线学习(异步)互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课堂设置最佳化、教学质量最优化。

二、学习保障

(一) 经济援助

新冠疫情导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直接影响美国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学生学业预算严重不足。为保证学生继续学业,美国一流大学启动一系列专门针对疫情的援助项目。例如,施行较为宽松的贷款政策。美国一流大学一方面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贷款机会,另一方面允许有还贷压力的学生暂时冻结还款,延长还款期限。同时,继续资助已开展项目。尽管面临疫情,美国一流大学的财务每况愈下,但仍坚持继续资助已有项目,不因经济问题削减已设立的资助项目。再次,针对性地减免部分费用。疫情期间大部分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学习模式发生了变化,故学校在收费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食宿与通勤费用减免、食宿补贴等。

联邦政府对美国大学生展开了疫情专项资助,与学校联手抗疫,保证学生学业正常进行。2020年3月27日,联邦政府签署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为学生贷款延期了6个月时限,同时拨放126亿美元设立高等教育紧急救济基金(HEERF),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紧急资金。联邦政府要求HEERF的一半资金必须以紧急补助金的形式直接拨给学生,其余用于支付因COVID-19危机而中断校园运营的相关费用。

(二) 技术与设备支持

美国一流大学学生在线学习过程是借助各种在线平台完成的。新的学习模式需要技术设备加持,做好学生的技术培训与服务支持是各校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在线学习必须保证学生适配相应的设备和基本学习条件。其次,学校注重引进新的技术项目,开发拓展学习系统,搭建学习社区平台,构建开放多元的资源获得渠道。另外,美国一流大学加强与软件信息公司合作,为学生争取免费开源软件。再次,注重学生技术培训与使用。鉴于学生技术背景不同,未必都能熟练操作各软件,学校技术部门发布了详细的操作指南,包括文字材料与视频材料。此外,该部门还为学生提供全天候覆盖的技术升级与疑难解答服务。

(三) 健康保障

疫情期间，学生的健康防护职责主要由各学校健康管理中心承担，除基本的消毒、隔离、安全措施以外，工作任务的重点在于新冠肺炎病毒知识科普与咨询建议等。新冠病毒不仅对学生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同时还诱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如心理恐慌、长时间社交隔离的不良情绪、远程学习不适等，致使大学生压力持续增加。从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结果来看，71%学生强烈地认同新冠肺炎引发的压力使他们无法安心学习。由疫情带来的学业压力已然对学生学习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为缓解学习压力，帮助建设良好的学习心态，美国一流大学教与学中心联合健康管理中心针对性地给予学生详细的建议与实质性的帮助，如增强运动、合理安排学习与休息时间、及时沟通、获取家人支持等，同时还安排相应的学业导师帮助指导学习与自我管理，排解压力。

(四) 学业辅导

远程学习需要高度的自律，分心和缺乏特定的学习场所导致学生在家学习困难。由于无法和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致使学生学习成效不佳，因此强化学业咨询与辅导，保证学习成果显得尤为重要。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在原有的业务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开展学业咨询与指导的虚拟服务，加强在线服务，提供更完备的学业咨询与辅导。

三、教学保障

(一) 重申教学原则，加强教学指导

美国一流大学重视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主张在线教育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技术。美国一流大学强调教师无论何时都要尊重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坚持卓越的教学使命。疫情当前，学校建议教师重新调整教学期望、授课目标、大纲、内容等，并在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上予以针对性地指导。

(二) 提高在线教学参与和互动，达成有效教学

针对师生互动缺乏，课堂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国一流大学重点建议教师要帮助在线课堂营造学习的社区氛围感，增强教学的“社会临场感”。一方面学校提醒教师要承担起引导学生参与学习共同体构建的责任；另一方面鼓励学生与教师一起学习、讨论，营造共同学习的氛围。

(三) 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实现无障碍教学

毫无疑问，教师在技术上得到支持与培训是保证在线教学质量的前提。美国一流大学对教师的技术支持颇为重视。一般由本校信息技术部门联合教与学中心为教师提供所需的软件资源、使用指南、咨询服务以及相关的培训等。学校与信息公司合作，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开放资源，便于教师自行开发更多的技术使用功能，还开设在线教学过程中的打光、声音以及后期视频录播、剪辑等细节方面的教程，助力教学效果完美呈现。

四、评价保障

(一) 学业水平与人文关怀并重的评价导向

学业评价是教学环节中的重要一环。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仍然正常开展评价活动，但因大部分学生远程参加线上教学，其评价措施主要是针对教师，以教师配合调整为主。从各大学学业评价举措分析可知评价政策的总体原则是既适合线上与混合教学模式又能真实反映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同时要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凸显特殊时刻人性化的关怀。各学校还注意多途径收集来自学生的反馈意见，并根据反馈做出回应，酌情改进后续教学。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的评分政策与过去传统的评分方式有所不同，主要采取宽松的学生成绩等级评价政策。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秋季学期的评分将取消“不合格”档，对于事实上处于F(fail)档成绩的同学，任课教师会报告本人与学校，但不合格的表现不会被记录在成绩单上。这部分学生成绩则被评为NE(no election)等级，与正常的I(incomplete)等级相比，该等级的完成期限更灵活，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补修课程。

(二) 侧重全过程学习评价

新冠疫情给美国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常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学生接受线上教学的环境各异，且部分学生的家庭环境、经济能力等不足以支持较好地进行线上学习，因此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一刀切地采取传统的课程评估方式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美国一流大学告诫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观测收集学生学习参与、学习成效以及作业表现等信息，重视系列测评，将“考试”穿插进学期全过程。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在春季学期评分政策里明确表示疫情期间对学生学业的评价要侧重于平时学习而不是传统的期末评估，避免在危机时期给学生的心理健康施加额外的压力。

(三) 严谨规范、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一流大学对疫情期间的学业评价采取了人性化措施，但仍强调无论何种形式的评价都必须遵循考试诚信原则。美国一流大学提醒任课教师要建立课程评价规则，并在评价之前让学生明确规则。各大学的学业评价政策也一再重申师生必须要共同遵守《荣誉准则》(Honor Code)。远程在线考试在技术实现上还不是十分流畅，因此美国一流大学鼓励教师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辅助期末终考。各大学主要实行一对一口试、介绍/演示、项目/论文等评价方式。一对一口试主要是教师针对性提出访谈大纲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评估学生的理解水平并促进良好的对话沟通。

五、总结与启示

(一) 树立自觉的质量使命理念，变监控体制为支持性系统。

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疫情期间，美国一流大学始终追求继续让学生享受优质教学体验，并以此作为危机应对的关键目标与原则底线。在具体保

障过程中强调为学生主体与教师主体服务，不遗余力地支持教育教学、学术科研等，保证卓越与成功。我国一流大学必须将质量保障根植于学校发展的使命之中，促进支持教学理念融入主动意识之中，才能坚持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之下以保障教学质量为首要任务，转变过去监督评价式的“生硬”保障手段，全力以赴支持教学质量发展。

（二）构建多维的内部教学支持体系，提供精细化与专业化的教学保障。

教学质量是多部门多举措共同发挥效用的结果，仅凭单一部门孤军奋战难以有效保障教学质量。美国一流大学教学质量保障离不开组织机构内部之间明确的职能分工、协同合作与平等友好的共同服务支持。我国一流大学可参考借鉴美国一流大学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构建跨部门相互协作的多维服务支持体系，共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培养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服务意识，提升管理与服务的科学化水平，力求达到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支持。

（三）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一切围绕学习质量提升展开。

“大学生学习是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根本因素，提高教学质量本质上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质量。”高校教学质量保障的根本是学习质量保障，即构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质量保障支持服务体系。学习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过程性、发展性的主动行为活动，需要学生主体、教师主体、管理主体等全力配合。美国一流大学从学生主体出发，以学业发展需求为中心，对学生学习的各方面(经济预算、身心健康、技术准备、学习管理、课程学习、辅导咨询等)进行保障，而非仅限于课堂教学与成绩评估。此外，对于学生的学习心理、学习习惯、环境与技术支持、准备度、学习方法、自我管理是影响有效学习的重要因素，均应加强关注与支持。

（四）关注教师教学能力的持续发展。

在教学保障上，美国一流大学一向注重教师教学学术发展。针对疫情带来教学模式的改变，美国一流大学重点在教育原则、教学设计、教学交互、技术能力等方面给予指导，注重教师教学能力持续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能。目前，我国一流大学的教师发展项目主要是针对新进教师的职前训以及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对全体教师教学能力持续性发展投入不足。调查发现，我国高校教师对疫情期间在线教学从技术使用、教学能力、教学效果等都不甚满意。以此为契机，结合美国一流大学的经验，我国一流大学应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师教学效能，组建由专家团体、教学管理人员、教师群体等构成的开放教学共同体，通过咨询求助、团体辅导、个别辅导、沟通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持续性发展与提升。

摘自：《高教探索》2022年第4期

作者：江艳、吴凡

责任编辑：王燕苹

韩国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是韩国最高科学精英教育机关和最早的研究型中心理工科大学, 始建于1971年2月, 最初称为“韩国科学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KAIS), 1981年与韩国最大的综合研究机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Kore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IST)合并为“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 1989年6月又与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分离, 同年7月兼并了韩国科技大学。主校区位于大田科学城, 技术经营大学院设在首尔。

KAIST的办学目标定位于注重原创性研究和提供最优质的教育教学服务, 力争成为领导韩国科技产业界的核心人才教育基地和发展核心技术的基地, 并最终成为一所世界最高水平的研究中心型科学技术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法》规定,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够应用基本理论的杰出科技人才, 促进国家的工业发展; 开展长期和短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推动国家战略性技术进步; 促进产学研之间的多样化合作。在政府对教育部和科技部改编合并之前,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是韩国唯一不属于教育部管辖, 而直属于科技部的高校,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韩国政府的高等教育理念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逐渐从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转变。

(一) KAIST研究生课程设置高度国际化, 注重培养学生科研能力

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作为高校院所人才培养质量的中心环节, 包含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课程设置、图书资料以及办学经费等多个子系统。在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结构类型比重以及具体管理运营方式方面, KAIST非常注重借鉴美国研究型中心高校的课程设置模式, 并结合自身办学实际,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设置体系。以2021年秋季学期所开设的课程为例, 学校课程数目多达4171门, 学生自主选择的余地大。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培养学生宽厚的知识基础, 学校和院系都在逐年压缩必修课程所占的比例。

为了保证授课质量和授课效果, KAIST开设的课程大多以小班授课方式进行。通过分析KAIST的课程比例, 可以发现该校课程设置中英语授课比例在逐年攀升。学校官网公布的课程统计资料显示, 全校2010年春季学期英语授课课程数为391门, 而2021年春季学期英语授课课程数则增加为810门, 英语授课课程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覆盖面越来越广, 诸如生物和脑科学工程这些专业更是达到了95%以上。KAIST在2010年外国教师和学生的人数从80人增加到500人。2021年的韩国大学综合评价中, KAIST在总共38个指标的22个中都领先于其他兄弟院校, 其中KAIST的英语授课比例是特别值得提出赞赏的。此外, 随着留学生数目和外籍教职员工比例增加, 以及课题项目的来源等国际化指标的改善更是超越了其他兄弟院校。

在课程设置以及具体管理运营方式方面，KAIST实行富有灵活多样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区别于国内高校的选课模式，KAIST开学的第一周，学生可以边上课试听边选课，感受教授的授课方式及考核方式满意与否，然后再确定是否修该门课程。学校向学生提供了最大的自主学习空间和时间上的灵活性。KAIST课程设置基本没有任何入门介绍性的内容，而是直奔最新的研究课题和学术前沿。

KAIST实行严格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科目的考核方式由教授自己决定，每个教授有自己的考核评价风格。KAIST灵活多样、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方式和评价方式，极大程度地调动和发挥了学生自主钻研的积极性。在这种考核评价方式面前，通过大量地反复阅读高水平的论文，学生自己就可以真正体会和发现创新点，不断满足探索的好奇心，增强不断深入钻研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丰富自己的视野和思维空间，这正是做科学研究真正的乐趣源泉所在。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主思考和创造性的自由，对自己的学业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KAIST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免试入学和“宽进严出”的弹性学制。硕士毕业年限一般是两年，博士是三年到四年，但按期毕业的寥寥无几。硕士主要侧重课程学习，前两个学期进行专业知识学习，最后两个学期论文写作；博士课程的学习则比较复杂，前三个学期修完30个学分就可以达到参加毕业综合考试的学分要求，剩下的时间要参与大量的科学研究、科研项目。学校对于研究生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要求很高，指导教授提出的毕业条件比学校更要严格，甚至要求学生发表SCI文章至少在5-8篇方可毕业。

KAIST学生刻苦钻研和发奋学习的良好氛围，除了利于创造性培养的教育教学方式外，还主要来自学业的巨大压力。为了培养最优秀的生产实践科研人才，激发学生竞争意识，KAIST施行严格的“末位淘汰制度”。KAIST倡导自由的学习环境激发了学生们求知的热情，学生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对自己的学业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为学生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

(二) KAIST人才培养经费保障来源多样化，依赖科研水平进行反哺

KAIST现有1个全球英才教育研究所，2个研究中心(包括卫星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能源、环境、水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5个研究所(包括生物世纪研究所、IT跨学科研究所、复杂系统设计研究所、纳米世纪研究所、光科技研究所)。每个研究所下还各设有5个研究中心，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韩国高等科学技术院二氧化碳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13年成立，开发有关二氧化碳资源的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再如仿真机器人研究中心，该中心研发的人形机器人HUBO成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火炬手之一，创造了机器人传递圣火的首个世界纪录。

KAIST拥有具备国际水准的教育、研发设施，实施学士、硕士和博士连读制度，采用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的高级人才，为韩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政府承担了KAIST所有办学经费，得到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大力扶持。

KAIST既承担国家课题研究，同时也接受企业委托开发，与三星电子、现代电子、LG半导体、SK通信等多家著名企业建立了产学合作关系，根据企业需求从事课题共同研究和定向人才培养，所需经费由相关企业提供。此外，KAIST还十分重视国际联合教育与研究。KAIST与国外诸多知名大学皆有合作项目；与10个国家的15所不同的大学共同开发了40个双学位课程计划；还拥有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即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KAIST二氧化碳管理中心。

KAIST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建立产学合作集群，发展可持续性研究创新体系，完善课程体系，培养创造型融合人才，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到2031年在教育创新、研究创新、技术商业化创新、国际化创新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与发展。

KAIST是韩国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都很优秀。相对于韩国其他学校而言，KAIST教授学生之间的师生比率最高，教学人员与本科生的比例基本稳定保持为1:6左右。所有的教授都拥有博士学位，外籍老师都是业内的知名教授，专职教授65%以上都来自美国排名最靠前的八所理工类院校。

充足的财政经费支持保障学校可持续发展。KAIST作为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给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绝大多数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全额奖学金。2017年KAIST学生全年人均奖学金达到679.34万韩元，到2018年KAIST学生全年人均奖学金高达748.37万韩元，由此可见全年人均奖学金的金额有所递增KAIST充足的财政支援，主要来源于产学研合作的良性循环机制，学校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实现科技项目攻关，科研专利获得在企业内部孵化产生效益，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回报，企业可以继续加大对学校教育和科研的大力资助，继续攻克技术难题。技术的转化和转让以及良性互动的合作循环机制源源不断地为学校注入活力，实现了企业与学校双赢的局面，使得教授拥有足够高的人均经费，造就了足够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教职员工、学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充足的财政支援称之为KAIST综合实力和学术科研产出的最坚实后盾和保障。

三、KAIST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启示与思考

KAIST凭借其特色化办学得到了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浦项钢铁集团、三星电子、国家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多个部门的大力支持。我国创建世界一流高校可以参照

KAIST等国外高校的模式和经验，创建一所规模小、管理机制灵活、学生和教职员素质高、学科间富于交叉和复合，具有强烈学科生长点的学科群的研究型中心高校。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在如下几方面重点突破：

（一）要找准自身学校科学的办学定位。

KAIST坚持自身办学特色，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紧盯工程技术研究前沿，致力于培养素质优良、业务精干、专业扎实的工程技术研究人才。这对于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走“综合化、规模化”模式给予了很好的借鉴意义。要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找“特色”，不求规模和专业学科的齐全，只求办出高水平 and 鲜明特色，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人才培养质量和竞争力，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要注重“产学研”结合，凝练学科方向和学科建设资源，发挥学科建设的“反哺”功能。

通过科研成果的企业化转化和运营，形成学校和企业的成果转化“无缝有机对接”，从而为学校 and 教职员提供充足的办学及人均科研经费，打造出足够优良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在学科建设方面，要注重不断凝练学科方向和整合学科建设资源，充分利用学校优厚的学科试验平台，通过人才流动的竞争机制使教师队伍保持一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吸引海内外业界优秀的研究人员作为自己的学科骨干，打造学科梯队和团队建设。既注重礼聘主要领域的一流大师和若干优秀海外华人青年学者，还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价考核机制和竞争公平、评价严格的科研氛围、足够雄厚的教育科研经费支持，来保证注重学校现有人才的稳定，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使青年人才对自己事业发展有希望，提高学校整体教学科研水平和国内外知名度。

（三）学校各项管理机制要灵活和人性化，通过营造“外松内紧”的学校课程学习氛围、尊重学生自主创新和钻研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

要在吸引大量优秀生源入学后，要精选少数，通过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和人性化的配套服务设施和改进学校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以形成富有竞争力和自主创新学习能力的一流的学生队伍。其次，应站在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在学校的财政、人事等方面赋予学校最大限度的自主权，注重加强在基础科学领域投资和扶持力度，从人员配置、机制保障等多方面来切实着力支持基础研究。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尤其是对于研究生教育事业而言，随着国务院颁布实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政策文件，标志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进入一个新阶段，建设“双一流”的关键是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近些年，我国重点高校意识到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逐步重视和加强研究生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得到了逐步提升。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生教育质量构成和影响

要素众多繁杂，牵涉到学校和国家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因此应不断摸索和借鉴学习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借鉴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客观实际，尊重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以及人才成长、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力争研究生教育通过提高自身人才培养质量来保持、巩固和强化发展自身竞争力，以质量带动发展，这样才能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道路。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第2期

作者：张雷生、朱莉

责任编辑：王燕苹

「海外视野」

日本海外学校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海外学校，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外务省牵头，在日本之外创办的国际学校。根据文部科学省统计数据，1971年至2020年间，日本在海外开设了95所日本人学校、228所海外补习学校和7所私立海外学校，日本人学校和海外补习学校在籍学生人数达到了38250人。

日本海外学校类型与管理

目前日本海外学校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人学校。该类学校是实施与日本中小学同等教育制度的全日制学校。日本人学校的招生对象仅限日籍子女，主要为日本外交官、日企员工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学段上，日本人学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日本人学校一般由海外日本人协会、海外企业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共同构成的学校运营委员会负责日常运营工作。在课程内容方面，日本人学校教授与日本本土学校相同的教学内容，使用原版日语教材。

第二种是海外补习学校。该类学校主要为海外日语学习者和日籍子女提供日式教育，是一种非全日制国际学校。海外补习学校一般利用周六日和放学时间为学生提供日本小学或中学部分课程，并以日语为主要授课语言。在运营方式上，海外补习学校与日本人学校一样，由学校运营委员会负责日常运营工作。相比日本人学校的“封闭性”，海外补习学校的国际化程度更高，在招生、教师聘用方面包容性更强，但也存在学校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偏低引起教师流动性过大、教学质量难以保障等诸多问题。

第三种是私立海外学校。此类学校在招生对象、教学内容、教材使用方面与日本人学校基本相同，但在运营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教师聘用方面，私立海外学校的教师主要由日本本土学校自行招聘并派遣，不需要经过文部科学省统一安排。

日本海外学校的功能属性

2022年6月17日，日本《海外教育机构教育促进法》颁布并实施，明确了日本海外学校的发展方向。

第一，日本海外学校要巩固已有的办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达到与日本本土学校同等的教育水平。为此，文部科学省扩大海外教师派遣规模，确保海外学校教职员充足。文部科学省充分利用各地推荐的优秀教师和大学师范生资源，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和在职研修培训，保证外派教师具有相应资质与能力。同时，外务省加大海外学校的补助力度，提高外派教师待遇，提供远程学习和信息化设备，帮助海外学校优化校园软硬件环境，保障海外学校安全。

第二，日本海外学校要变革原本以“母语学习”为主导的课程内容，拓展日籍子女的全球化视野，确保日籍子女养成尊重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促进以日本海外学校为中心的国际交流，努力将日本海外学校打造成全球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沿阵地。日本海外学校以培养国际人才为目标，实施课程开发项目，设计覆盖全学段的国际课程，利用海外特色资源开展实践性教学，培养受教育者的全球胜任力。

第三，日本海外学校要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增加国际学生比例，形成多元文化氛围，促进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理解。日本海外学校与当地日本企业等紧密协作，向国际社会传播日本教育理念。同时，日本海外学校与当地学校密切交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促进师生交往，成为日本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

对海外中国国际学校的启示

充分利用独特优势，拓展对外交流功能。日本海外学校不仅承担满足日籍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需求的基础功能，也是日本国际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平台，更逐渐成为日本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海外中国国际学校首先应该满足驻外机构、海外中资机构工作人员以及赴海外经商或务工人员随居子女的就学需求，同时为海外华侨华人子女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便利，不断提升办学质量与水平，实现海外中国国际学校与中国本土学校同等乃至更优的教育质量。其次，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要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开发将国际视野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国际课程，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最后，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要加强与当地学校的沟通和联系，传播中国教育经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优化学校管理，创新办学模式。在日本海外学校的办学体系中，海外学校的日常运营和决策均由日本人协会、家长代表、企业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学校运营委员会负责，政府机关主要发挥监督协调作用。这样的办学模式既能发挥政府对海外学校办学质量的“兜底”作用，又能充分调动民间团体和学生家长的积极性，实现政府、家长、企业、协会等多方协同。中国学校走向海外也应将国家力量和社会资源相结合，开辟多元海外办学模式，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团体、中资企业的积极性，鼓励家长参与学校治理，在降低办学成本的同时，更好地提高海外学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海外办学的重要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以及提高学生的身份归属感。日本海外学校通过使用本国寄送的教材，在海外课程中加入日本文化、历史和道德的内容，实施与日本本土中小学同等的教育制度以及聘用日本教师来保障日本教育的“原汁原味”。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增加中国文化课程比重，提升学生中文水平，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的认同。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2年10月27日

原文标题：日本海外学校以培养国际人才为目标

作者：陈川、宋佳，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黄欣丽

「中心动态」

关于邀请参加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平行论坛 ——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三）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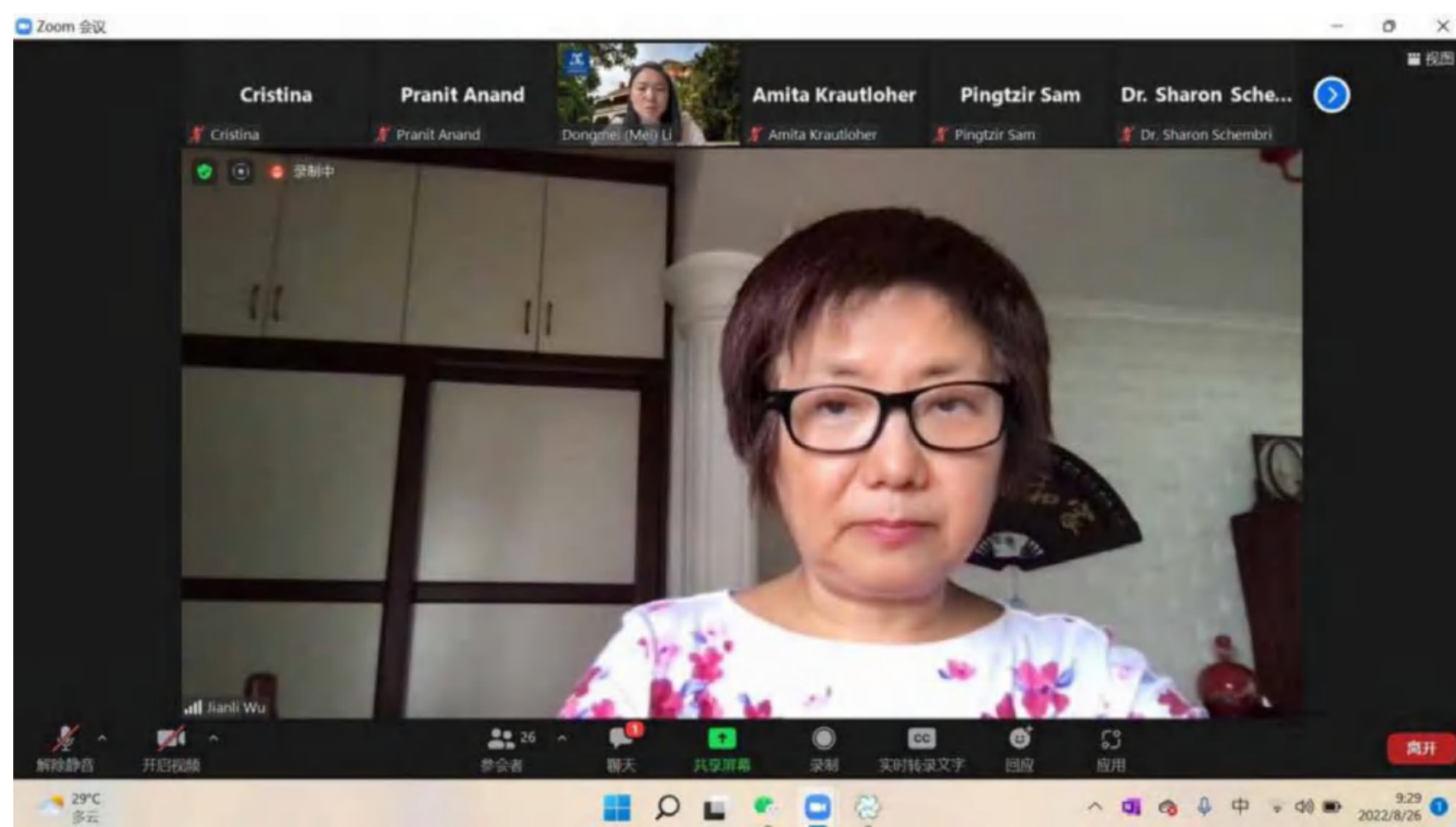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教育年度盛会，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也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教育盛会之一，每年吸引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余名全球教育界精英和社会各界代表参会。

作为本届年会的平行论坛之一，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三）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承办，将邀请国内外高水平院校和教育研究机构代表、专家学者聚焦新时代如何重塑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实践、国际合作与交流政策以及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等热点议题开展研讨，分享国际教育行业同仁们关于国际办学质量保障经验，探讨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新举措和新机制。

具体举办时间待定，详情请关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年会官网www.cacie.cn。

| | |
|---------------------|--|
| 13:30 / 14:00 | 致辞 Opening Remarks 1.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涉外监管与办学处领导致辞（待定） Representative of Division of Foreign related Supervision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2. 广东省教育厅交流合作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李金俊致辞 LI Jinjun, Director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fice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3.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杨中民致辞 YANG Zhongmin, Vice President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 14:00 / 14:20 | 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1.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教学框架分析 Teaching Framework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发言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务处处长 吴恒亮 Speaker: WU Hengliang, Director of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 14:20 / 14:40 | 2.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质量保障与创新 Quality Assur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发言人：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马卫华 Speaker: MA Weihua, Vice President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an of The Aberdeen Institut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 14:40 / 15:00 | 3. 中外合作办学评价与排名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Evaluation and Ranking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发言人：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冯伟哲 Speaker: FENG Weiz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Department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 15:00 / 15:20 | 茶歇 Tea Break |
| 15:20 / 15:40 | 主旨发言 Keynote Speeches 1. 后新冠疫情时代的跨国高等教育：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保证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Quality Assurance for Student Learning Enhancement 发言人：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 莫家豪 Speaker: MO Jiahao, Vice President of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
| 15:40 / 16:00 | 2. 国际合作办学的语言教学与质量保障 Language Teach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发言人：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大中华区代表 李文凯 Speaker: LI Wenkai,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representative |
| 16:00 / 16:20 | 3. 新形势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的思考——基于对独立法人机构调研报告的分析 Reflections on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n the New Situation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Independent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University 发言人：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研究基地主任 吴剑丽 Speaker: WU Jianli, Dea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SCNU), Execute Dean of The Aberdeen Institute (SCNU), Director of the Cross bord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Research Base of CEAIE |
| 16:20 / 16:40 | 4. 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与能力提升 Quality Assurance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发言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学术交流与研究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李阳 Speaker: LI Ya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Exchange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AIE) |

中心主任吴剑丽参加受邀参加2022高等教育国际化论坛并作专题报告



2022年8月26日，中心主任吴剑丽受邀参加2022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研讨会上，吴剑丽教授做了题为《新形势下中国中外合作办学的策略与挑战》的主旨报告，主要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形势、政府政策引导、九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的经验及其办学成效、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挑战、并介绍了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的国际办学历程等五个方面展开。

吴剑丽谈到疫情的对于各大高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疫情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招生面临严峻压力、高校对在外学生的管理难度加大、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受限、科研合作受阻、拓展海外合作伙伴遭遇瓶颈。另一方面，各高校有序推进教育在地国际化，系统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质量；拓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深化跨国科技合作创新；丰富国际合作形式，以网络化、智能化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留学教育质量；优化出国留学的工作布局，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式发展。

吴剑丽教授指出中外合作办学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促进教育开放双向发展。



欢迎订阅我们
扫码可获取PDF文档



华南师范大学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联系我们

☎ 0757-86687180

☎ 528200

✉ xlhuang@ibc.scnu.edu.cn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桃园西路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